

“对话苏州创新(2016)”高阶论坛在苏州召开

编者按:“创新四问”,是省委寄予苏州的一份沉甸甸的期望,期待苏州为全省的“转型出关”破题开路,引领示范;“创新四问”,同时承载着省委对苏州的信任和信心,是对苏州创新潜力和创新能力的信任。回答好“创新四问”,不仅是苏州完成好全省发展战略的历史使命,也是苏州自身实现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12 月 28 日,第三届《对话苏州创新》论坛在苏州工业园区会议中心举行。本次会议以“聚力创新——苏州如何引领?”为主题,围绕“创新四问”,开展对话讨论,力图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中央和省委精神与苏州实际相结合,通过领导与专家的有效对话共谋良策,助推苏州新一轮改革发展。

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讲话



五大发展理念中处于核心位置。我们江苏省十三次党代会刚刚召开不久,这次党代会的主题就是“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省委李强书记作完报告以后就来到苏州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党代会报告。我们感受到了他对苏州的要求概括起来讲就是要创新引领转型发展,谈的最多的就是创新,苏州创新必须要走在前列。

一些对比,我们和国内先进城市相比,在创新方面,比如和北京、上海,特别深圳、杭州,苏州确实在很多方面存在差距,所以非常希望今天各位专家学者对我们苏州在创新方面存在哪些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同时,对下一步我们要走怎样的路径,无论从思路也好、举措也好、方向也好,能够帮我们多把把脉,提出很好的建议和批评,这也是我们和苏州大学共同推进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的初衷和目标。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对话,当时提出这个思路、第一个这样做的就是当时的市委书记现在的江苏省省长石泰峰同志。

希望我们各部门把开展“创新四问”活动作为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的一项重要工作,精心组织实施,抓好认真学习部署、广泛开展研讨、形成对策举措三个环节,切实把“创新四问”活动推向深入、推向基层、推向创新一线,通过开展把全市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聚力创新”目标任务上来,加快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总之,我们非常希望这次活动能够给苏州带来实实在在的收获,再次感谢各位专家,感谢苏大为这次活动做的工作,谢谢大家!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同志们!

今天非常荣幸,请到这么多专家来参加第三届对话苏州论坛,这次的主题就是围绕创新,特别是李强书记对苏州创新提出的四个战略性命题开展对话,很高兴有这么多名专家学者通过头脑风暴为苏州提出下一步围绕“创新”的思路和建议,我也非常感谢主办单位苏州大学为这次活动的举办做的大量工作。

非常简短说一说和苏州大学一起商量办这个活动的出发点。早在 2014 年的 12 月 14 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考察时表示,“要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切实把创新抓出成效,形成有利于出创新成果、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新机制。”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

在前列。

改革开放以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苏州经济快速发展,已经在全国处于比较靠前的位置,我们今年预计 GDP 大概在 1.55 万亿的水平,增长 7.5%—8%之间,预计会高于 7.5%,财政收入大概增幅在 11%,也就是我讲地方公共财政,我们去年是 1560 亿,今年将会是 1730 亿,净增 170 亿人民币。全部的财产收入是 5800 亿。从苏州产值角度而言,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业基地,已经连续多年突破 3 万亿。

总体而言,苏州经济的体量、规模在全国还是位居比较前的位置,大概在第七位,财政收入在第六位,人均 GDP 在 2.2 万美元。但就创新而言,我们也做了

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曲福田讲话



尊敬的各位专家、同志们!

今天在美丽的独墅湖畔,我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举行本年度的对话苏州创新活动,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南京以及苏州的 13 位知名专家围绕“聚力创新,苏州如何引领?”这一主题进行讲演交流献计献策,为我们深刻感知创新理念、感受创新脉动、感悟创新要义提供了宝贵的学习经验,也奉献了

思想的饕餮盛宴,令人启迪。在此我再次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各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我们也希望各位专家一如既往地关注苏州,给予苏州聚力创新以更多的帮助。下面我简单讲三点体会与同志们交流。

一、深切感受对话苏州创新活动的鲜明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

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自觉践行经济发展新理念,抢抓机遇,推动苏州创新发展取得成效。在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上,省委书记李强同志针对苏州创新提出了四个问题,我们在省委常委、市委周乃翔书记的带领下,深入开展回答创新四问活动,对标找差创新思路,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就在于深入贯彻省市党代会精神,强化创新发展新理念,书写好创新“四问”的苏州答卷,感觉到此次活动有三方面的特点。

1.体现名城名校深度融合。按照名城名校创新驱动协同提升融合发展的目标,苏州市委市政府和苏大2016年初签订了名城名校融合发展合作协议,重点推动十大工程,其中新型智库工程明确支持苏州大学东吴智库举办各类品牌性活动,定期承办对话苏州发展等高峰会议,对话苏州发展活动自2014年创办以来,自我超越不断进步,今年更加丰富了融合发展的内涵和形式,提升了融合发展的层次和水平。

2.促进理论与实践衔接互动。本次对话苏州创新活动不仅是一般的理论研讨,更是一次高端的决策咨询。今天专家们的讲演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互动融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一方面13位专家长期参与决策咨询研究,是国内顶尖专家,拥有决策咨询丰富经验,有效发挥了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另一方面,专家在深入了解苏州的基础上都精心备课,形成了指导苏州创新的专门的讲稿,既贯彻了新的发展理念,贯彻了世界先进的创新理论,又是专门为苏州开的药方,所以我们要好好研究这些讲稿,服务于苏州的创新发展,回答好李书

记提出的创新“四问”。

本次活动增设了交流互动环节,面对面交流研讨,增强了对话的特质,学术上的交流对我们政策制定的推动意义非常重大。

3.迸发思想与方案政策火花。今天的13位专家紧扣主题,各展所长,即将怎么看,又将怎么办,既出创新思想,又出创新方案,处处闪烁智慧的光芒,并对苏州如何借鉴先进经验提出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了理论穿透力与实践指导性的有机统一。

二、高度重视以科学决策促进发展,打好聚力创新聚焦富民的主攻战。聚力创新首先在于决策,全市各单位要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从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角度做好这篇大文章,以科学决策引领创新发展。

1.深刻认识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性。习近平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禀赋。回首苏州改革开放历程,创新是始终贯彻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上世纪80年代,我们抓住农村改革机遇,开创由农到工的苏南模式,90年代又抓住开放的机遇,打造了由内转外的开放样板,其实无论是开创苏南模式还是打造开放样板,都离不开市委市政府的科学决策、理性执政。当前苏州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实现“凤凰涅槃”的关键点,推进新突破,实现新跨越,必须以科学决策加速聚力创新。

2.加强咨政研究、规范决策流程。创新不仅仅要有勇气,充满激情,还要有科学的思路和可行的举措,决策部门要有善于纳谏的勇气,主动对接智库产品供

给这一活水,建立健全重大决策工作制度,畅通智库建言渠道、成果转化通道和智库合作通道,让智库全程参与决策,努力使智库在政策制定上插得上手、说得上话,从而使智库真正引领决策、影响决策、支撑决策、跟踪决策以及服务决策。

3.把专家真知灼见转化为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苏州创新目标就是要加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积极发挥在全省创新格局中的引领性作用。目前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科技创新十大工程,旨在探索质量更高、效益更高、结构更优、优势释放更充分的创新发展路子,下一步我们将认真研究专家的意见和建议,邀请专家开展战略性、针对性的政策研究,提出具有学理支撑和应用价值的政策建议,指引我们在创新的道路上久久为功。

三、高度重视以决策咨询指导政府工作。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既要真抓实干,更要聚焦才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决策咨询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把决策咨询工作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1.加强地方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加大对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等新型智库的扶持力度,加强对苏州创新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加快推出一批针对性强、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使各类智库成为苏州发展的政策效果评估者、社会舆论引导者,成为与苏州软实力建设相适应,在市内外、省内外乃至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思想库和创新园。

2.加强咨政平台建设。要继续做好对话苏州发展等平台的积极作用,大力拓展管用有效的咨政新平台,吸引专家学者进入党委政府工作,去思考去谋划,解决实践之问,为推动苏州创新发展不懈努力。

3.加强咨政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为所有,但为所用的原则,制定实施市政人才培养规划,整合汇集各领域专家学者与业界精英,打造咨政人才专家库,重点推出咨政领军人才和青年杰出人才,鼓励和支持有较高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的党政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参与咨政研究工作,建立完善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机制,壮大结构合理、成果卓越、深受信赖的咨政人才队伍,广泛凝聚精气神,干好创新的经济活。

再次感谢各位专家在百忙中前来苏州指导我们的工作。衷心地祝愿各位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苏州大学熊思东校长主持对话活动



为全面贯彻苏州大学与苏州市“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答好江苏省委书李强向苏州提出的“创新四问”，力争为苏州创新发展“转型出关”建言献策，助推苏州新一轮改革发展，12月28日，由苏州大学主办，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协办，苏州大学东吴智库承办的“对话苏州创新(2016)”高阶论坛在工业园区会议中心举行。

本次论坛邀请到的专家有：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著名经济学家洪银兴，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研究员肖林，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宣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薛澜，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吴晓波，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陶一桃，我校党委书记、江苏省委决策咨询专家、省政府特约研究员王卓君，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吴江，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唐杰，上海大学原副校长、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唐豪，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特聘教授徐康宁，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史健勇，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原院长、创新经济研究院院长蒋伏心。

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曲福田，我校党委书记王卓君，校长熊思东，苏州市领导徐惠民、黄爱军、吴庆文、盛蕾、姚林荣、游鹰、徐明，以及苏州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市人大、市政协领导，市委秘书长，苏州各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相关委办局、直属单位负责人；我校全体校领导，相关学院、职能部门负责人及部分专家教授，中央及省市媒体记者等参加

了本次论坛。

熊思东校长主持论坛活动。他首先对各位领导、专家的莅临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感谢。他指出，本届论坛以“聚力创新——苏州如何引领”为主题，是在全市上下同心聚力答好李强书记提出的“创新四问”背景下召开，围绕“在全省创新格局中，苏州怎样发挥引领性作用”、“在推进自主创新中，怎样追求原创性成果”、“在全面提升创新水平的基础上，怎样打造标志性品牌”、“在创新生态系统的打造上，怎样更好地体现苏州的开放性包容性”等专题开展对话和讨论，力争为苏州创新发展“转型出关”建言献策，引领苏州新一轮改革发展。

周乃翔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创新”在“五大发展理念”中排在首位，处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省委书记李强在江苏省第十三届党代会上对苏州提出“创新四问”，要求苏州真正把创新作为引领转型发展的主动力，在全省创新发展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近年来，苏州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科技创新能力持续稳步提升。但是也要清醒认识到，同一些城市相比，苏州在科技创新方面还存在着不小差距。苏州如何尽快补齐短板，构筑创新发展新优势，更好地肩负起省委赋予的使命，是需要下苦功来谋划、下大力气去突破的重大课题。他希望各位专家畅所欲言、多提宝贵建议，共商推进苏州创新发展之策。希望苏州大学继续深入实施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积极为苏州创新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本次论坛分为上午和下午两场。洪银兴、肖林、王卓君、宣鸿、薛澜、吴晓波、陶一桃、吴江、唐杰、唐豪、徐康宁、史健勇、蒋伏心共十三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创新驱动产业迈上中高端”、“上海建设全球

科创中心的实践及对苏州建设全球产业科技创新高地的建议”、“苏州创新生态系统的思考”、“中关村创新创业环境建设”、“苏州转型国际创新城市的战略思考”、“杭州创新创业生态体系”、“深圳双创体

系形成的经验及反思”、“提升人才对外开放度打造国际创新人才集聚区”、“深圳经济转型经验”、“创新驱动中的科技金融”、“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产业创新升级”、“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战略选择”、“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企业创新”等作了主题演讲，为如何回答苏州“创新四问”奉上了一场思想和知识的盛宴。

随后，与会人员与专家学者们围绕苏州聚力创新主题展开了提问互动，面对面进行了交流研讨。

曲福田在总结发言中对各位专家为苏州如何引领聚力创新把脉献策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举办对话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党代会精神，强化“创新发展”新理念，兴起“聚力创新”新热潮，书写好“创新四问”的苏州答卷。他指出，本届论坛特点鲜明，体现出苏州大学与苏州市名城名校深度融合，促进了理论与实践衔接互动，迸发出思想与方案政策火花。他要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以科学决策促进发展，高度重视以决策咨询指导政府工作，打好聚力创新、聚焦富民的主攻战，放大此次对话活动的“溢出效应”，继续开展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提出具有学理支撑和应用价值的政策建议。

熊思东校长最后表示，苏州大学是苏州的大学，是苏州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四问”是新一届省委领导给苏州布置的大课题，也是给苏州大学布置的大课题。未来，苏州大学将与苏州市携手奋进，认真落实“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主动对接苏州战略需求，加快促进苏大创新资源与苏州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打造校地融合发展共同体、创新发展共同体，以实际行动答好苏州“创新四问”的苏大篇章。

•专家视点•

编者按：聚力创新－苏州如何引领？——在第三届《对话苏州创新》论坛上，来自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南京等地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创新战略、产业科技创新、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环境、科技创新政策、创新人才、科技金融、产业创新、中小企业创新、杭州创新发展经验、深圳创新经验、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等内容作了主题演讲，为回答苏州“创新四问”奉上了一场思想和知识的盛宴。现将专家的观点转载如下：

创新驱动产业迈上中高端



洪银兴 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1991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颁发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十七大、十八大代表，江苏省人大第八、九、十届常委会委员。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组成员、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经济学家》杂志副主编等学术职务。

主要研究方向是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的理论和政策。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出版《经济运行的均衡与非均衡分析》《现代经济学通论》《转型经济学》《创新型经济：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等学术专著二十余部，在《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等杂志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洪银兴教授以问和答的方式，分别从九个方面对创新产业驱动迈上中高端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给出了高屋建瓴的建议和切实可行的路线图。

第一个问题，苏州创新驱动的目标是什么？洪银兴教授认为目标就是创新驱动产业迈上中高端。地区经济是以产业作为度量单位的，地区竞争优势表现为产业优势，现在无论是创新国家还是创新省份的建设，产业进入中高端都是主要的衡量指标。尤其是当前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需要去产能，更重要的是要培育新的产能。而培育新产能关键是要调结构，抓产业升级对一个地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江苏省而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首先就是针对苏州这样的地区提出来的。

第二个问题，产业中高端的方向是什么？洪银兴教授提出了三个具体的发展方向：一是发展反映新工业革命的高端产业，包括智能制造、机器人、新能源、新材料、环保产业、生物技术等；二是要发展体现于传统产业和服务业的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三是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依靠自主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掌握价值链上的关键技术和核心，在已有的全球价值链上攀升到更高

环节，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他认为苏州要特别重视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问题。对苏州来讲，产业中高端任务非常紧迫，尽管苏州制造业基础走在前端，把握住了每一次发展机遇，但都需要有升级的内容。因此，洪银兴教授就苏州地区产业中高端发展提出了两个具体目标：一是作为一个制造业基地，应该以先进制造业为特色，以“绿色化、智能化、柔性化、网络化”为先进制造内容，从源头上缓解资源环境恶劣引发的制造业及相关产业链的重大变革；二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高科技企业，要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进入价值链的中高端。

第三个问题，产业中高端靠什么？高新技术产生在哪里？洪教授认为，产业创新必须依托科技创新，当今世界技术进步更多的来源于科学的新发现，创新阶段要上延到发现新技术的基础研究阶段，最新科学发现成果要迅速转化为新技术，实现大的技术革新。当前的产业创新需要依托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当今全球科技革命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基本要求是重大基础研究成果的产业化。核心技术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他认为这三方面的核心技术领域中，我国与国外处于同一起跑线，高校

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新产业技术将成为产业创新的捷径。

第四个问题，推动产业中高端的突破口在哪里？洪银兴教授指出，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对接，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实现两者的对接，关键是要将科教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并概括出了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三种主要模式：一是中关村模式，大学、科技园、科学院在中关村进行科技创业的模式；二是深圳模式，4个90%以及虚拟大学科技园；三是产学研协同的苏南模式。

第五个问题，科技和产业创新最有效的对接方式是什么？洪银兴教授认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是科技和产业创新最有效的对接方式，主要形式是大学和企业共建协同创新平台。但需要强调的是，产学研协同不是一般的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合作，而是指功能协同，产是产业发展，学是人才培养，研是科学研究。相比转移新技术，产学研各方共同介入研发平台，具有许多新的优势，能够在研发平台上源源不断地开发新技术。相比科技创业，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一个有组织的创新方式，更为高端。此外，洪教授认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关键是解决好激励问题。大学的目标是要追求科技水平和成果价值，以延续科学研究获取资金投入和充

•专家视点•

分实现科学研究的价值，而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是创新成果商业利益的获得者，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更需要企业作为投资主体，而政府则需要对产学研起粘合剂作用。

第六个问题，最新的高科技企业产生在哪里？洪教授认为产生于科技创新和科技创业的融合。率先发动产业化创新的常常是进行科技创业的科技型小企业，而主要形式是科技创新者带着孵化出来的创新成果去创办企业。所以，关键是要建立一个科技创新和创业的生态环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是指人人办企业，而是大众参与创新企业，而是要求现有的所有企业要进行科技创业。这个生态环境类似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所言，由有创新思想的人士提出创意，不同投资主体参与风险投资，不同生产商参与转化，进行市场推广以及终端客户的评价和学习。而科技创业的环境第一需要有创业的集群，第二要有创业的氛围，第三要有创业的政策。

第七个问题，科技创业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洪教授指出，科技创业成功的关键在于科技企业家，所以，苏州要培育更多的科技企业家，并从体制上为科技企业家的成长提供条件。

第八个问题，“互联网+”对科技创业有哪些技术支持？洪教授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一定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推动科技创业。因为“互联网+”能够提



供众创平台，降低就业和创业的门槛，能够提供市场的、技术的信息，降低创新创业所需要的信息门槛。“互联网+”可以提供创新成果的市场实现平台，也可提供风险投资的众筹平台，所以要支持科技创业应该充分的发挥“互联网+”的作用。

最后，哪些因素决定了地区的创新能力？洪教授特别提出，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关键在于经济体的活力，包括创新的动力、创新的能力、对新事物的宽容度以及相关的支持制度，其中最根本的是企业的活力。

就苏州地区而言，促进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更上一层楼的主要途径；第一是创新要素的集聚能力，主要包括创新

企业和创新企业家的集聚、创新机构的集聚、创新人才的集聚以及孵化器、创客空间的集聚。如果解决好这四个方面的集聚，地区的创新能力就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第二是需要建立促进创新驱动的体制架构，要实现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以及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收益对接。第三，科技创业是创前沿的新兴产业的方式，创新什么产业、采用什么技术、创办什么科技企业都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一要支持基础研究，激励引领新产业的前沿科学研究；二要衔接产学研，激励协同创新；三要支持科技创业，激励风险投资；四要集聚创新要素，激励高端创新人才。

上海建设全球科技中心的实践以及对苏州建设全球产业科技创新高地的建议



肖林

现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研究员，经济学和金融学博士生导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站长、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导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曾在国务院研究室作为起草组成员，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文件起草。受聘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十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兼职教授、特聘教授，兼任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经济年鉴》主编，《科学发展》杂志主编。

发表论文 500 余篇，出版专著《新供给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大纲》《国家试验》《融资管理与风险价值》《全球城市》等 20 余部。主持完成《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结构性改革与结构性政策问题研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中国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机制与风险控制研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家战略研究》《“面向未来 30 年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等 100 余项重大课题，获中国发展研究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优秀研究成果奖、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等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一等奖。2014 年获“2013·经济学人年度中国十大著名经济学家”称号。

肖林研究员主要通过阐述上海市科技创新中心的构建经验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对比苏州现阶段的发展，对于苏州市建立产业科技创新高地提出了几点

建议。

党中央对上海提出了两大国家战略，一是自贸实验区战略，二是科创中心战略，这两大战略实际上落到习总书记

对上海提出的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上，排头兵载体就是自贸区的改革，先行者就是科创中心。2015 年 5 月，中共上海市第十届委员会第八

• 专家视点 •



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聚全市之力，全面深入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肖林研究员指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总的目标是到 2020 年形成科创中心的基本框架，2030 年成为城市核心功能，其目标内涵是综合性、开放型科创中心，国际科学、科技和产业的策源地之一，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是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具体来看，在实践中，一是要有对创新资源的集聚力；二是要有科技成果的影响力，上海作为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一定要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成果；三是要有可以吸引全球人才的创新创业的环境；四是要有新兴产业发展引领力；五是要有区域创新辐射带动力，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绝不是上海六千多平方公里的范围，上海的创新必须带动上海的周边城市甚至长三角整个的联动开放。

进一步地，他指出，在政策上主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是突破创新链的瓶颈，形成市场导向型的创新机制和体制。上海市可以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如全面清理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放宽“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市场准入管制；改革财政科技资金管理，实施财政科技投入联动与统筹管理；放宽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使用、处置的权限等。第二是人才引进。建设科创中心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在哪里，创新就在哪里。调查显示，回国的留学生首选城市大概 40% 是上海和北京，因此针对海外人才，可以考虑实施“中国绿卡”。此外，在人才评价方面，特别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要进行重大调整，

按照市场化取向职称评审等。第三是构建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网络，进一步改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在科技金融方面，上海发展较快，风险投资、科技银行的发展也比较快，投贷联动、创新创业和新兴产业融资力度较大。另外，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建立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同时实行知识产权管理改革，在浦东成立专利、商标、版权三合一的知识产权局，强化对知识产权保护等。第四，优化布局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和创新载体，当前上海各区县创新热情高涨，集聚了众多海内外的年轻人，张江综合自主创新园区最具代表性。围绕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推进国家级新一批大科学设施和若干重大创新功能型平台落户上海。到目前为止，上海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大工业制造格局，海陆空都有，海陆空全部可以制造，大制造业体系与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都要发展。从制造业体系来讲，上海是填补国家需要的，为实现国家的中国制造 2025 战略，上海各区县很多工业园区在进行升级。如张江核心区，依托双自联动，着力打造张江科技城，自贸实验区的范围已经拓展到了 120 平方公里；如外高桥、金桥制造业和张江的高新技术产业园，是多功能、多园区的结构，与目前全国现有的 11 个园区不完全一样，有的是以制造业为主，有的以服务业为主，有的以港口物流为主，最大的好处在于，一是可以全方位的综合性代表国家进行自贸实验，第二可以把科创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与自贸实验区联动。

除了重点解决上述问题，肖林研究

员认为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突破。第一就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仍受到约束；第二创新型人才和城市生活成本还是比较高；第三，对比纽约、硅谷创新高地，上海支持科技创新的环境仍存在差距。在对标纽约、硅谷等创新中心，上海承担着国际金融中心、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两大国家战略，这里商务成本存在不相容的问题。上海 2040 年城市总体规划里，提出与苏州、湖州、昆山等地联动，包括居住联动、人才联动、产业联动等，都值得思考。第四在于跨国企业研发中心还未融入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最后，肖林研究员就苏州建设产业科技创新高地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认为，苏州的功能定位准确，可以从“产业能级、创新环境、发展动力、高效布局、开放水平”这五个方面做些统筹和努力。首先要重视科技资源的集聚，包括科技要素、科技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其次是市场化的科技资金投入机制，要加强共性技术平台的建设；最后要打造创新环境，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形成创新的氛围。就政府管理效率而言，肖林研究员认为，上海是领先于苏州的，行政审批还有制度的交易成本都走在前沿。从整个布局来说，苏州比上海有更大的空间和潜力，已经形成了“一点两核三带”的产业创新布局，而且各具特色。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对于不同区域的布局还要考虑一个产业的协同和分工的问题，特别是在苏州整个范围内，不同的区域之间要尊重产业发展的规律，布局要在全市的范围内有一个统筹规划。



·专家视点·

苏州创新生态系统的若干思考



王卓君 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党委书记。兼任江苏省政府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江苏省委研究室决策咨询专家,江苏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基层党建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地方政府与城市治理”决策咨询研究基地主任。

主要从事文化学、政治学、管理学和教育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十余项,出版《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科技创造心理学》《科学认识论史》《中国大学外部经济关系研究》《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服务型政府研究》等学术专著十余部,译作有《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科学技术对文化的挑战》,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等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关于苏州创新生态系统的若干思考,王卓君教授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第一点是关于创新“四问”。李强书记在党代会上对苏州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创新“四问”,这“四问”指出了苏州在创新方面存在的不足。王卓君教授认为,“四问”的核心就在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建立,要实现前面的“三问”,最重要的就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和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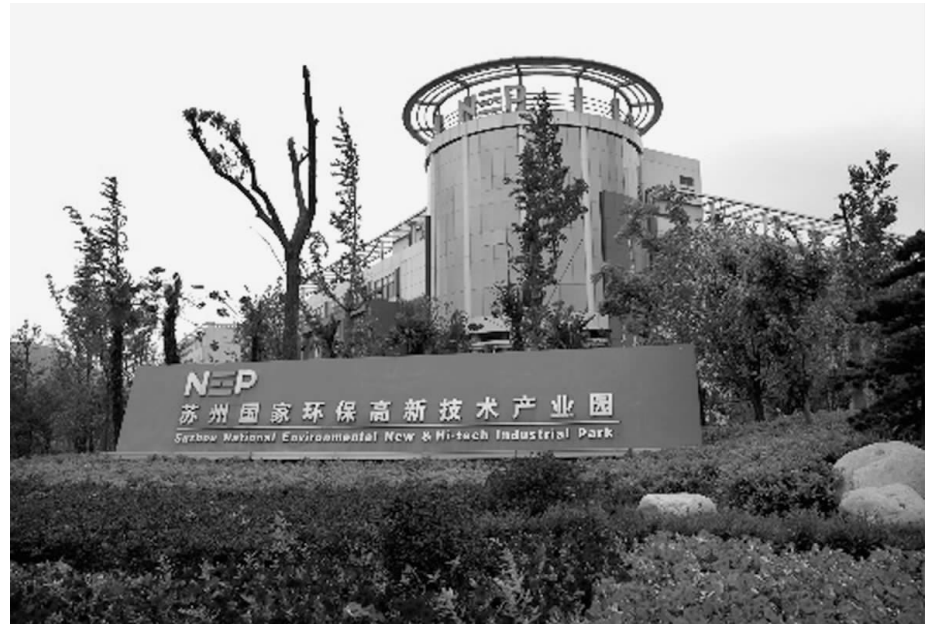
第二点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创新生态系统这一概念自 2004 年提出,主要的研究角度有三个方面,王卓君教授主要就创新主体、创新网络和产业集群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创新主体是创新最重要的要素,而创新网络内的各个节点或者各个组成单位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点苏州当前的产业组织模式不利于创新。虽然苏州的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是非常领先的,但 2014 年苏州市的 R&D 经费投入占 GDP 的比重是 2.7%,2015 年则下降为 2.66%,之所以会出现下降,是因为总量变大了,但是 R&D 投入没有跟进,而相比较之下,深圳的 R&D 投入占 GDP 的比重是 4%,上海是 3.66%。进一步地,2015 年深圳全市财政科技类支出 209.3 亿元,苏州仅为 88.3 亿元,PCT 国际专利申请深圳是 1.33 万件,而苏州仅为 908 件,差距甚大。苏州市的制造业规模很大,但产业创新能力不强,说明苏州在技术创新的生态位是非常低端的,是个技术消费型城市。其次,苏州的创新缺乏重大产业技术的引领者,苏州没有一项技术处于全国的领跑水平。新兴产业与国际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新型显示技术与国际水平相差 6 年,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虽然是苏州今年发展的重点产业,但仍与国际先进领先水平相差 7.6 年。此外,苏州具备产业颠覆能力的企业相对偏少。新三板企

业数量和平均资产总值与其他一些创新能力强的城市相比都有差距。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全球共有 229 家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其中有 33 家在中国,北京 16 家,上海 8 家,但苏州一家都没有。

究其原因,王卓君教授认为,苏州的辉煌主要得益于全球产业链的梯度转移,苏州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福特制的大批量生产模式,是一种标准化、大批量、大众化、同质化的思维。而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要求的是小众化、个性化、多元化和差异化,应当从过去发展订单经济转变为现在定制经济的发展。其次,苏州采取后发优势战略,导致在技术上主要靠引进,投入的主要是低级的一般的生产要素,需求上依靠外需拉动,用低成本要素而非依靠生产率提升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此外,纵向的垂直产业链也不利于创新发展,不利于知识、数据、信息等产业内部的流动。还有就是主流经济模式的缺陷主要就在于将各个要素之间隔开,导致交流不充分、互动不积极。

第四点建立双面市场是苏州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突破口。传统的价值链商业模式中,上游、下游、终端非常清晰,而现在的产业模式中,企业应该不再仅仅承接上游和传向下游,要上下游全面兼顾,成为双面市场。苏州产业结构具有典型垂直的“价值链”模式,是单面的,在信息化时代,企业如何链接消费者,同时,与供应商、分包商形成一个互动的系统这将是竞争力的重要保障。硅谷就是典型的双面市场和区域创新平台,成为了各种创新要素或者各种产业要素能够相互互动的环境。美国对硅谷的研究是非常多的,特别把硅谷作为开放型的网络型产业组织,形成了良好的逐渐发展、逐渐更新的创新生态系统。过去传统的波士顿地区的 128 公路则逐渐衰退,这个逐渐衰退是因为它也是比较明显的垂直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此外,以深圳华为为例,华为公司不仅仅是华为,而是华为系,深圳有 2000 家和手机有关的公司,大家分工合作,形成了手机的生产网络。王卓君教授又以两个典型地区台湾新竹和印度的班加罗尔



•专家视点•

为例进行了说明。2004 年,台湾新竹发展出现停滞,主要原因就是其纵向的产业链模式。而班加罗尔现在风头正进,它就突破了以产品为中心的产品制造思维,而真正以客户为中心,形成了基于区域特征的创新体系。王卓君教授还列举了苏州一些成功的案例,如:苏州工业园区的生物纳米产业园以及吴中区的盖睿和科沃斯等企业,他们就建立了网络式的产业组织,提高了企业的创新力。

第五点苏州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对策建议。第一是“双力驱动”,一个是核心企业,企业要用两面市场的方式和形态来构建由基于企业、供应商、分包商、消费者的创新体系;一个是政府,政府要对创新环境不断改善和营造,这方面

苏州政府做的相当好。第二是以双面市场模式,内外结合,全面改造传统的垂直型产业链,形成以核心企业为主的包括供应商、分包商、消费者良性互动的网络型的产业组织新形式,特别是在一些战略型新兴产业领域,比如生物医药和纳米等产业中培育双面市场型的网络型的企业组织。第三是积极建设双面市场的基础上,围绕企业网络型的创新体系,加快推进产学研紧密联盟,重视发挥本土大学在苏州创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人才、文化、消费、教育、医疗等方面实施相应政策举措来集聚创新要素,提高创新浓度。第四是调整完善苏州目前实行的创新评价体系,避免在创新领域各个板块之间的同质化恶性竞争,在苏州大市范围内形成数个战略性的创新

极,以创新极推进创新要素的高浓度高密度的集聚,推动形成若干具有全球性创新影响力的产业集群。第五是在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强烈推动下,通过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政府的制度变革,加快培育苏州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上市公司和独角兽企业,这些企业的要求是必须拥有处于不断创新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并具有两面市场网络型的产业组织新形式。第六是创新引领下,苏州发展第三波模式,要从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模式,通过创新引领真正成为“中国创造”,形成技术创新高地,由此实现在世界上的技术领跑,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为中国制造”再到“世界制造”的大提升,形成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波模式。

中关村创新创业环境建设



宣鸿 中关村管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负责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科技产业发展促进、规划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现代服务业试点和创业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1985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金属材料工程系热处理专业;2001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专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2004 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获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长期从事新兴产业发展促进研究,主持编制了《中关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引领工程》《中关村互联网跨界融合创新示范工程》《创业中国中关村引领工程》等。

宣鸿教授就中关村的六大基本要素以及三个方面的政策环境阐述了中关村创新创新环境的建设。中关村是我国第一个高新区,也是第一个自主创新示范区,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关村的发展非常重视,先后八次为中关村的发展做过重要批示,指出中关村要加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力度,向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然后为全国的创新发展战略实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这就是中关村在新时期国家党中央给的新的定位。

围绕这个定位,宣鸿教授介绍了中关村的发展情况。中关村现有 2 万家科技企业,有 1 万家是国高新,另外有 1 万家是村高新,2015 年实现总收入 4.08 万亿,约占我国高新区的 1/6。区域内收入过亿元的企业接近 3000 家,有上市公司 295 家,每年约有 20—25 家科技型企业上市,占全国创业板的 1/7。中关村内企业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特征,呈现了高科技与服务业态融合发展的态势,区

域能耗极低,万元增加值能耗约为全市 1/5、全国 1/10。

围绕中关村建设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一发展目标,宣教授提出,

中观村要建立一个有机的、联动的、相互关联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要重视六大因素,即领军企业、高等院校、高端人才、高等投资、天使投资为代表的创业



• 专家视点 •

投资、创业服务组织以及创新创业文化。同时区别于地方政府强有力、直接介入等方式，中关村采取的是政府、市场和社会联合共治的方式。区域内有 100 多家协会，接近 200 家的产业创新联盟，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多的是以企业为代表的创新主体，很多政府政策是通过社会组织来到企业里面来间接实施的。

第一大因素，重视领军企业的发展。中关村内有 466 家企业为重点服务对象，大企业在整个环境和体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大企业一是可以不断培养新的创业团队、培养人才，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创新创业的自己的子系统和微循环，既可以给创业初创公司提供平台，也可以给初创公司提供技术，2015 年有 24000 家的小企业创办，接近一半创业者来自大公司。二是大企业本身也是一个生态，给新创办企业提供市场，本身具备创新活力，也推动一大批上下游企业在中关村形成了联想系、金山系、小米系、乐视系等。宣鸿教授还介绍了独角兽企业，中关村拥有很多独角兽企业，这是因为中关村以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为主，大概有 67% 是服务业态，有别于部分地区的制造业态。随着中国移动终端的增多，中国网络的价值要大于一般国家，这就是美国和中国产生大量的

移动互联网独角兽企业的原因。

第二大因素，高校和院所。高校是技术源头，培养人才的摇篮，吸引一些高校，特别是现有的高校里吸引一些人才来建设新型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服务创新联动发展的研究平台非常重要。

第三大因素，高端人才。中关村已经成为了高等院校海归的落脚点，为此中关村制定了十二条政策，这正是别的地方所不具备的，例如：实行外国人在中国工作的积分制度，引进顶尖级人才，打造优越的自然、人文环境等。

第四大因素，天使投资和创业金融。天使投资在创新创业过程中非常重要，中关村在天使投资方面有极大的优势，中关村活跃着大量的天使投资，形成了数十条获取金融的途径方式。

第五大因素，创业服务。中关村拥有 96 家创新型孵化器，这些创新型孵化器不仅仅是提供空间，更重要是服务。如果孵化器收入有 50% 以上来自于服务，那么它就是一个创新型孵化器，就是靠服务来创收，而不是靠房租。

第六大因素，创新文化。宣教授提出鼓励成功、宽容失败，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区域特别是一个创新中心，就一定是一种宽容精神，允许有人跳槽，允许有人跌倒，而且资本要鼓励他，宽容

失败是一个区域里能不能融得下创新的很重要的一种文化。

此外，宣鸿教授还提到了中关村的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与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方面，他认为，要建立开放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建设中关村信用体系、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联盟促进会等。法治环境方面，成立中关村核心区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基地、中关村知识产权诉前调解中心等。政策环境方面，他提出了三维政策体系，以构建生态系统为核心，搭建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平台，形成支持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服务体系。

最后，提到苏州与中关村的两地合作，宣鸿教授对苏州的创新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在创新环境营造上，要更多地创新文化营造上下力气，苏州企业甚至可以把一部分适于放在北京研发的项目拿到北京去研究，最后应用在苏州。如今有了移动互联网，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布局，按照长板理论，中关村的很多工作也可以到苏州来做，两地合作前景巨大。要充分发挥两地科研、产业的互补优势，强强联合，发展人工智能、颠覆性新材料、生物技术等，共同打造创新高地，携手探索联合治理模式，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苏州转型国际创新城市的战略思考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国务院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国家战略咨询与综合评审特邀委员会委员、“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经合组织(OECD)科技与创新顾问组成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网络(SDSN)领导委员会联合主席、联合国大学(UNU)理事会成员、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非常任高级研究员等。

1991 年获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学位，其后受聘担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1996 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管理、科技及教育政策、风险治理等，在这些领域多有著述，并于 2003 年及 2011 年曾先后两次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课。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等。

薛澜教授从苏州创新驱动发展的优势、产业结构、经济外向型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分析了苏州目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以匹兹堡和底特律两个城市的发展历程为借鉴，提出了他对苏州建设国际创新城市的一些思考。

薛澜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摆在最为重要的位

置，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只有不断提高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回顾人类发展历史，18 世纪中叶开始，人类人均 GDP 有了飞跃，原因就在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带动了生产力的提高，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有着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从现在来看，手机等各种工具

以及基因检测技术等的发展都体现出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也正因为如此，十三五规划五大理念之首就是创新。

苏州市的创新指标在全国领先，以工业园区为代表发展迅速，就现阶段面临的挑战而言，薛澜教授指出：首先，苏州市的第三产业以传统服务业为主，规模以上的服务业排名中还是以比较传统

• 专家视点 •

的电信服务业等为主，真正有名的大企业目前至少还看不到。实际上，苏州第三产业规模也不小，但真正有品牌的企业，目前很难列举。中国企业年会发布的服务业五百强里面，苏州有 4 家企业入围，但前百强没有。其次，产业发展对外资依赖比较强，而且以加工制造为主。2014 年苏州的贸易依存度为 1.58，这是相当高的，一方面说明苏州跟国际联系得比较广，但另一方面可能也会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然后在自主研发能力上，按照 2013 年国务院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意见，预期到 2015 年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5%，目前苏州只达到 1%，苏州拥有较强指标的同时，但实际上研发投入只有 1%，相当一部分可能不是自主的知识产权，存在内在的一些问题。

薛澜教授将苏州与其他城市进行了对比，指出苏州如果从表面来看，都遥遥领先于杭州，GDP 的产值、地区的人均产值等等，但杭州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各方面资源禀赋依赖小。以杭州滨江新区为例，积极支持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研发，发挥自己种树、自己育苗的“树论”，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滨江的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相对来讲，苏州的外资引进在产业发展和规模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未来的发展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进一步地，薛教授就苏州转型需要考虑问题提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城市转型方面，以匹兹堡为例，其成功从失败的钢铁工业城市转型为一个高科技城市，完成了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其中有几个非常重要因素：第一，社会资本极其重要，匹兹堡人均社会慈善捐助的资本是最高的，有很多社会组织在城市面临转型危机的时候发挥巨大作用；第二，有很好的知识创新基础，匹兹堡有两所非常好的研究型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对当地的转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匹兹堡原来的经济相对来讲比较多元，钢铁工业非常强大，但其他方面也有很多比较好的基础，这一点可以帮助它推动转型。而另一个例子是转型失败的底特律，它的特点是产业结构单一，转型比较困难，它的地理位置位于五大湖畔，铁路、水运都非常发达，上世纪 50 年代是发展的黄金时代，后面由于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产业转型、城市治理等，最后整个城市破产，后果十分严重。

随后，薛教授进一步强调定位对于转型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大多城市定位出现的问题都是功能太全，都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物流中心、创新中心、产业中心、航运中心等。转型过程实际上也是治理模式的转型，这种快速的转型和当前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规律之间，如官员的调整、规划、政策、项目等，有着很大的对立。在区域定位

上，薛教授认为，苏州需要考虑在长三角地区的定位，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以及国际定位。

其次，薛教授强调了地方政府的作用，从研究创新政策角度来讲有四个方面，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生态、解决市场失灵、建设创新体系、实施创新战略等；在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生态方面，地方政府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创新需要一个公开、开放、透明的竞争环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环境，其他就做不了。在推动创新、鼓励创新政策变多的同时，寻租机会也在变多，使得执行落实成为了一个问题，实际上对形成一个稳定的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就会产生影响，所以如何真正创造公平的环境也非常重要。

薛教授指出，苏州在战略型新兴产业方面存在巨大潜力。中国还没有发达国家所享有的创新优势，因此，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很大困难。如果拥有创新优势，同样制造业可以生存下去，所以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加上创新元素。苏州外向型经济面临着国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崛起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用创新的生态去促进产业升级，可能是苏州面临的挑战，也是未来一个重大的机遇。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也是十三五期间可以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专项规划刚刚发布，实际上是战略新兴产业要在未来中国的产业发展当中成为支柱，在这个方面苏州恰恰有很好的基础。如何在这个过程中避免走规模扩张而技术不高的老路，如何增加创新元素，是一个值得思考问题。

最后，薛教授指出，下一步不管是国际经济环境的转型还是中国经济的转型，也为苏州的华丽转身提供了机遇。在下一步转型过程中，首先是能不能舍得放的问题，怎样从外延扩展到内涵深化成为苏州市下一步的重点；其次是如何慢一点，他认为一个生态的变化要有内在的自然规律，不管是文化的积累、矛盾的暴露、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时间，苏州转型也不是一天、一个月、一年可以完成的，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最后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创新生态的营造、创新系统的完善、激励机制的调整，都需要能够有真正可持续的机制，硅谷为什么长盛不衰，背后的机制和环境生态确实是可持续的。



·专家视点·

杭州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经验与启示

**吴晓波**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院长。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科学与工程评议组委员、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管理科学与工程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剑桥大学“全球化制造与创新管理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常务理事、英国剑桥大学制造研究院创始成员、国际中小企业联合会高级副主席。

长期从事全球网络中的中国企业创新与战略管理教学与研究，致力于倡导和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健康力量。基于中国及发展中国家实践提出“二次创新”理论，在创新管理、全球化制造与创新战略、信息技术与管理变革、包容性创新等领域开展了开拓性的研究。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十余部，其专著《全球化制造与二次创新：赢得后发优势》，获浙江省和教育部优秀成果奖。担任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sian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及《管理工程学报》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编委。亦从事企业战略管理咨询，曾任吉利、西门子（中国）、海康威视等多家企业战略顾问、独立董事。

吴晓波教授在讲话伊始，先对浙江与江苏的省情作了一个简单的对比，其中提到几个关键的数字：44,134,94,50,20。吴教授指出，江苏跟浙江很相似，地域面积大小接近，江苏比浙江稍微大一点，但是江苏的地理条件比浙江优越，浙江70%是山地，江苏70%是平原。44是指的全球500强中，江苏有44个，浙江也是44个；134和94指的是全国的500强民营企业当中，浙江省有194个，江苏有94个；50和20指的是500强民营企业当中，杭州有50个，苏州有20个。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江苏跟浙江都跑在很前面，但还是有差别的。

吴教授指出，创新生态体系将成为各省市下一轮建设的关键，这个体系的建设可能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因此要抓住它的核心要素，即企业、学校、人才、技术、风投、政策、文化，而各要素成分的不同造就了区域创新的不同特色。

吴教授将杭州与国际上三大城市进行比较得出结论，渥太华的“加拿大北硅谷”、以色列的“硅谷第二”、韩国的“韩国硅谷”这三者与美国硅谷的差别在于，这三者都是后来兴起的创新中心，而这种后来居上的经验更值得中国学习。

他着重强调，创客人才、创投力量、政策支持是杭州创新生态体系里面需要更加着力建设的三个方面，同时这三个方面也是非常典型的创新体系支柱，而杭州在这些方面有着良好的基础和鲜明的特色。杭州有四支主要的创新创业的队伍，被称为“新四军”，代表四支主要的力量。一支是来自企业的力量阿里

系，阿里在建设的过程中，培养了大量具有创新力的年轻人，阿里系的年轻人跳出来创业的比重在杭州占比非常高；第二支是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浙江大学牵头，还有其他大学一起参与的浙大系，这一批队伍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第三支队伍是浙商新生代，即第二、第三代企业家，这一代年轻企业家资金雄厚，实力较强且各有特色；第四支队伍是海归，而中关村的海归比例更大。

此外，吴教授还强调了金融服务的重要性。金融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在于，金融能够通过帮助全社会创造更高的生产力，提升创新竞争力，从而维持生存，但是如何让金融资本跟实业资本对接是个关键，其中政府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引导配套支持方面，政府应该采取大量具体的措施。杭州金融服务的链条之一即：财政资助—政策担保—科技贷款—还贷周转—天使基金—引导基金—上市培育。

吴教授还列举了其他的一些具体政策如人才政策、大学生创业政策，还有比较典型的“加减乘除”政策，即在资金扶持上做加法，税费征收上面做减法，搭建平台上做乘法，创业障碍上做除法等等。

杭州的滨江区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其特点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滨江区的增长点在于物联网产业的发展，在物联网的发展当中，形成了一个由五种要素相互作用的体系。

其一是政策引导。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物联网产业发展规划的出台，并于2010年开始启动，当时在全国处于领先阶段，因此不仅引领了杭州，也引领了

全国的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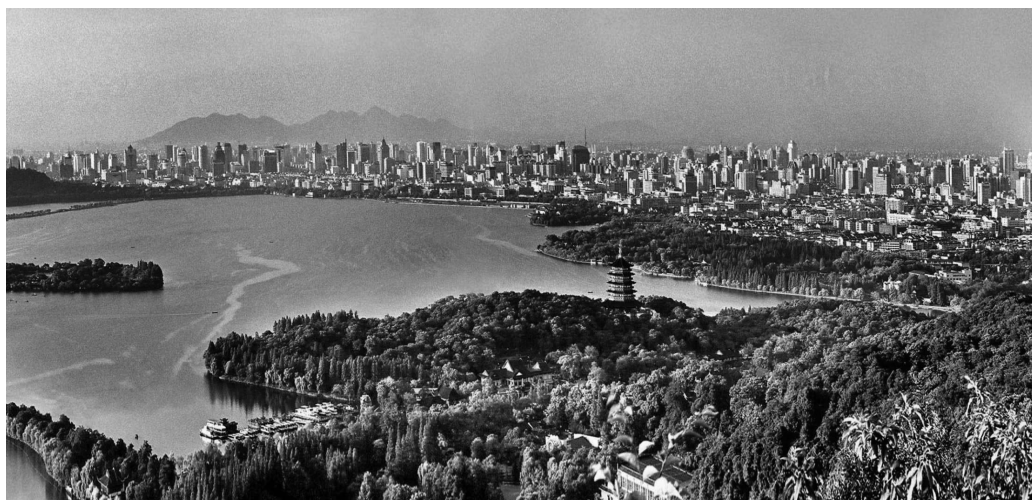
其二在于集聚发展，配套完善。促进了龙头企业的产生，尤其是海康威视、大华，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海康威视于2001年创办，由之前的小公司、十几人开始创业，逐渐发展到去年销售额达到253亿，增长迅速，其背后的发展规律值得细思。

其三是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性。杭州的一个创新点是“住创1215”，即“居住+创业”融合的新型众创空间，楼上住人楼下创业，这是较为理想的一种方式，解决了青年人创业的一系列问题，做到所谓的“零门槛、零等待、零距离”。

其四是两大公共服务平台的搭建，引导产业标准制定。一是以龙头企业为中心：以与中国电科集团的战略合作为契机，鼓励区内物联网相关企业、研究机构以及省内外高校积极参与，组建中国电科（杭州）物联网研发中心，抢占“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促进产业化”。二是以核心高校为龙头：组建各类技术中心、研发中心，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如，与中科院、北京邮电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等合作组建传感网技术研究和产业发展合作平台。

其五是择优发展，投资战略产业。投资新型战略产业及典型企业，对于选准的企业、产业，政府与企业敢于投入。滨江区财政年总收入100多亿元、地方财政60多亿元，5年来，累计全社会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达270亿元。财政投入方面有投入不一定有创新，但是没有投入就一定没有创新，财政收入里面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扶持产业的发展，尤其

·专家视点·



是用于研发,是有利于产业发展的。

吴教授还进一步提到中国的企业只擅长甲方、乙方合作,缺少第三方,没有意识到第三方服务体系的重要性,而杭州第三方的创业服务体系却相当完善。良好的服务体系有利于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除了政府给予创业者的一系列优惠和服务外,第三方企业和组织对于创新创业活动也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一个良好的创业氛围和完善的配套设施能降低创业者的进入门槛。而建设第三方创业服务体系是创建创新创业生态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在美国,政府积极引导商业机构和民间投资为创业者服务,构建成熟的创业生态圈,全美各地建成了不计其数的孵化器。这些孵化器不仅仅在技术和决策上对创业给予支持,更建立起了庞大的资源网络,为企业、投资人营造出了一种“共同进步”的氛围。而北京通过引导和支持社会化、市场化的新型创业服务组织发展,积极培育了创业服务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所以,要依托强势创新创业资源,给创业项目提供物理空间载体和用于信息交流、资本对接、项目扶持、市场推广的虚拟空间,整合提供融资服务、创业辅导、培训等全方位的服务。杭州的众创空间名气很大,做得也非常出色,其中主要有以下 6 种模式:社团模式、企业模式、物业模式、政府主导模式、虚拟空间模式、俱乐部模式。

此外,吴教授指出了杭州创新创业服务方面还存在的一些缺陷,在资源统筹、政策落地、氛围打造、服务平台建设、外国专家引进等方面仍存在短板,有待改进。从全国范围的创新创业热度来看,居前的是北京、深圳、杭州,跟 BAT 所在城市契合。从创业活动来看,2015 年杭州全年 1650 场,日均 4.5 场,

北京日均 11 场,深圳日均 4.6 场,广州日均 4 场。从公开的创业项目看,2015 年杭州共计 1364 个,北京达到 7939 个,深圳 2252 个,广州 1345 个。从创投机构数量看,杭州有 850 家,北京有 1773 家,深圳达到 2520 家,成都有 128 家,武汉 114 家。从上述数据比较来看,杭州的创新创业虽然在省会城市中名列前茅,但是与北京、深圳相比,差距依然较大。

杭州发展的整体战略主要有四个方面: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示范、科技体制改革、互联网大众创业集聚和引领全球电子商务。杭州最近两年 GDP 增速开始重新回到两位数,超过了 10%,主要贡献就来自于电子商务及其他相关点。

吴教授进一步强调,政府是市场环境的塑造者,也是公平竞争的维护者。通过对比江苏和浙江,江苏的政府比浙江调控的强度要高,从持续性看,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中核心的问题是自主性。

关于创新驱动的重要性,吴教授指出,创新体系的重要性以及创新建设的目标广为熟知,但是对于其所处的阶段及具体做法还知之甚少。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并亲自出席会议最多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出台的大多就是怎么做这一方面的政策,而不是讲为什么做,关键是怎样做,这才是硬道理,值得践行。

吴教授还提到李强书记对苏州提的“四问”,他表示,苏州经济体量大,要想起到引领作用,关键在于原创、品牌、包容、开放。苏州特别典型的经济结构是,外企占相当大一部分,这些外企是否能够在苏州有原创、是否能够在苏州开放包容,这就是很严峻的问题。下一轮的发展要考虑新的思路、新的道路,这并非否定以前的

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但是过去的支柱不代表还是未来的支柱。

最后,吴教授指出 GDP 与 GNP 的差别,并进一步解释,GDP 带来了一个陷阱,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强国,并非全是 GDP 大于 GNP 的,这是值得反省的一个问题。在下一轮发展当中,美国欧洲现在都很重视高端制造业,因此这些外企在苏州实现高端化的可能性较小。现在苏州面临的严峻问题是,高端产业回归到

发达国家,低端产业会转移到东南亚成本更低的国家,苏州的优势就是下一轮发展的持续竞争力所在。苏州的 GDP 占比中 40% 来源于是外企,30% 是民企,20% 是外省的民企。浙江在全国先进经济体当中是 GNP 大于 GDP 最大的省份,在省外浙江企业投资的所创造的价值相当于浙江省的 GDP,在国外和海外,浙江省有 600 万浙商在全国各地,有 160 万浙商在全世界各地,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就是一个地方的持续竞争力的体现。下一轮苏州的发展应该是放手让企业家去做,利用苏州优势,释放苏州潜能,主要可以从以下四点着手:

第一点,要全面转向对民营企业,对本土企业多多关注,帮助他们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拉美现象、东南亚危机的例子表明没有自主创新的企业难以持久,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点,从过去的“自上而下”的做法更多的转向“自下而上”,关心底层的需求。

第三点,塑造转型升级的新支柱。浙江特色小镇建设的提出并非偶然,它是对过去的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区的升级版,把民生跟经济的发展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新的生态系统,集聚了很多很多的资源,而且开放包容,这过程当中就需要新理念、新机制、新载体推进产业集聚、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

第四点,江苏特别是苏锡常,在引进外资方面做了很出色的工作,尽管这些外资可能会迁走,但目前阶段要关注外企的溢出效应,外企并非能够带走核心人员,这些核心人员可以在江苏创新创业,给予其更好更多的创新创业的机会,这可能是江苏特别是苏州下一轮发展新的亮点和增长点。

·专家视点·

深圳双创体系形成的经验及反思



陶一桃

中国经济特区问题研究专家。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 年于上海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胡寄窗先生。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深圳市学术领军人才，深圳大学理论经济学学科带头人、荔园领军学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省《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社科联委员。历任深圳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等职。

长期从事中西方经济思想与理论研究，研究领域涵盖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制度经济学等领域。近二十多年来致力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史和中外经济特区比较研究，并在国内外具有相当的学术影响力，其代表性著作《中国经济特区史论》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 35 本重点书系之一，获国家社科基金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并由英国帕斯国际出版公司英文出版全球发行，2011 年该书获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主持编撰年度《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国“双创”指数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报告》（蓝皮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史（1978—2018）”。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研究”，其成果《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一书入选 2016 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由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海外出版发行。

陶一桃教授首先类比为深圳和苏州这两座城市，从经济发展结构来讲，二者都是民营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城市，有很多指数很靠近，而且有一些指数，苏州排在深圳前面，不过从整体上看，深苏两市已经遥遥领先其他城市。

首先，陶教授介绍了深圳创新体系的形成。两个月前，李克强总理到珠海，期间陶教授与其课题组正在做关于深圳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利用联合国已经成熟的城市创新体系的三维评价标准对深圳创新体系进行了一个模型的评判，这个评价标准被称为三位一体评价标准，即环境支撑、资源能力和绩效价值这三个合在一起的大体系。通过这个指标体系的评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深圳创新已经呈现出明显的由创新要素禀赋决定的“塔形”的创新结构，所谓的“塔形”就是有一个宽大的“塔基”，这个“塔基”就是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机制和宽松的制度文化机制保障，是创新的基础。第二就是“塔身”，这个“塔身”就是创新的主体，创新主体在深圳表现为民营企业，再上面就是“塔尖”，这就是创新的方向。深圳高新技术已经成为深圳创新的主导方向，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塔形”结构的“塔尖”。最后概括起来，就是深圳已经形成了以制度环境优化、创新要素集聚为支撑，民营企业为主体，高新技术产业为方向的“塔形”创新体系，并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自发形成了制度供给、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创新绩效的 SSCP 的发展模式。结论为深

圳是一座创新绩效型、高活动活力型、中环境支撑型、低资源消耗型，在全国具有一定领先和引领作用的创新城市。深圳能够成为在全国领先的创新城市，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它是 38 年发展的结果。它得益于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得益于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相当长时期里具有先行先试的政治上的优先权，得益于深圳这座城市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得益于深圳毗邻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城市。深圳如今创新城市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积淀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绝不是一时创新政策促成的东西。

社会上真正能用创新，并且通过创

新改变世界、改变人的生活的人毕竟是少数，世界只有一个马化腾，中国也只有一个马化腾，马化腾以他的发明改变了 13 亿人，改变了世界近 70 亿人的生活方式，马化腾属于深圳大学，是深圳大学的校友，但是在中国，很少有人能够像马化腾那样去创新。

其次，陶教授总结了深圳创新体系的形成经验，得出了如下启示：

第一，政府的政治推动是短期内迅速形成创新制度文化氛围的主要因素，对于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的中国来说，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时间内是不可或缺且有效的。先有明智的政府才会有法治宽松包容的创新的制度文化环境，所



• 专家视点 •

以首先要求政府具有远见卓识，特别是中国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不仅仅在创新发展当中要从强权政府走向服务政府，而且还要学会从服务型政府走向授权政府，没有政府服务是不行的，政府服务过界了，社会也很难发展，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包括创新创造一个宽松的、自然的、有序的、法律的社会环境，政府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掌舵者，而不是划桨的。

第二，深圳 90% 以上的民营企业，是深圳创新的一个潜在并且非常具有生命力的力量。民营企业不会仅因为赚钱而创新，不会为了政策迎合、政策需要去创新，他们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王国去做一件事情，会及时把握市场变化的规律，巧妙地运用市场规律和政策给予的空间来实现他自己的梦想，所以企业家是一个社会创新的主要力量和主体。在深圳有三个 90% 在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产业 90% 是民营企业，研发投入 90% 在民营企业，专利的提供 90% 在民营企业，这是深圳发展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而且深圳的政府历届都是很明智的政府，深圳发展都是从先干了再说开始，所以政府最初期对企业家没有太多的约束和管理，正是由于选择的动力和激情，所以深圳才会有华为的任正飞、腾讯的马化腾。

第三，人力资本集聚的产业是创新的主战场，科技产业是构成深圳产业发展良性循环的基础。从 2016 年的数据来看，深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速度是 1.5%，对 GDP 的贡献率是在 40% 以上，

跟民营企业对 GDP 的贡献率相近，这表明在深圳，90% 以上的民营企业在从事高新技术产业，是深圳高新技术发展的一个主体。而且深圳在创新方面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得天独厚形成了所有制造产业发展的优势，即民营企业加高新技术产业，形成这样独特的优势。

第四，从深圳的创新城市形成来讲，移民城市的特质赋予了深圳冒险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品格。观念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是观念能够改变人，而人能改变社会，这个道理在深圳体现的非常鲜明。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最初移民城市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力对观念的碰撞使这个城市能够别具一格地发展起来。38 年间，这个城市依然还具有特有的冒险精神和敢闯的品格，积淀了不同的文化。创新首先要源自于文化和文化的碰撞，观念和观念的碰撞，在一个封闭保守的共同体当中，是很难寻找到并产生出创新的火花和思想。硅谷是世界创新的摇篮，他们一直保持创新的品格。不同文化的碰撞，移民城市给深圳带来这样的一个先天禀赋。同时，深圳市政府一直秉承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使这个移民城市敢于冒险的品格一直成为深圳这座城市独特的品格。

最后，陶教授给出关于创新的几点思考：

第一，政府是创新的倡导者和守护者，而不是创新的主体，创新应该是政府提供制度保障的市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优惠政策从根本上来说只能是权宜之计，特事特办的制度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代成熟并且法制化的制度。长

远来看，提供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文化环境既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又是创新和秩序发展的保障。

第二，市场是创新价值实现的检验者，具有企业家禀赋的市场中的经济人是最有活力也是具有巨大动力的创新主体。培育企业家阶层是降低交易成本、创新交易成本的最佳选择。遵循市场规律是一个创新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市场需要政府，但是政府不能够替代市场，依法治国不仅仅是政府要依法办事，更包括政府本身要遵守法律的约束。

第三，创新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次足以带动中国产业调整经济转型的伟大革命——转型，是中国由政治开放走向制度开放，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路径。创新的关键在于培育“创新为民族生命力”的这种认知与理念，培育一种正确的发展观与价值观。这种发展观和价值观不仅仅是对以往以更多财富消耗创造财富的野蛮创造观的反思，更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定位，那就是创新将作为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成为社会生生不息的创造财富的价值源泉。所以如果不能摒弃急功近利，如果不真正改变唯 GDP 的重点评价标准，创新就不会是一种文化，不会是一种淡定的生活方式，也不会是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只能是带着光环的浮躁。

一个民族不会由于缺少奇迹而毁灭，但会由于缺乏创造奇迹的思想而枯萎。创新需要热情，更需要理性，需要政策，更需要市场。创新预示着收获也包含着失败，预示着可能的收益也可能预

示着不可避免的成本。很多人收获的不是梦想成真的伟大，而是为实现梦想奋斗的历程，两者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来说都是财富。一个充满创新精神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包容失败、赞赏奋斗、崇尚精神、摒弃急功近利的社会，在享受创新中创意，在敬畏发明中创造，这是创新社会应有的品格与秩序，创新不是一夜暴富的狂热更不是投机的侥幸，而是要使更多人有尊严生活的良好状态。



·专家视点·

提升人才对外开放度,打造国际创新人才集聚区



吴江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国家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学科组成员、国务院创新驱动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行政科学学会执委、亚洲公共行政学会主席、东部太平洋公共行政组织副主席、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机构编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等。

长期从事公共管理与人事人才领域的政策规划研究,近年来主要承担起草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中国的人才资源状况》(白皮书)《国家十三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人才专章》《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做好引进外国人才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主持了 20 多项国内外重要科研项目,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加入 WTO 与政府治理模式

研究》《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研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重大问题跟踪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财政支出项目的绩效考评改革及其对我国科学基金的影响》等。

吴江教授指出,苏州引领创新不仅是在全国引领,因为创新没有边境,所以说引领应该是朝着全球创新的目标去努力。他重点强调了人才对外开放度,打造国际创新人才集聚区,并围绕苏州工业园区做了一些调研及评价。

吴江教授认为,全球科技发展、产业发展和人才竞争加剧挑战,人才需要向更深层次迈进,要更加强调经济开放与人才开放相结合,更加强调创新驱动与人才驱动相融合,更加强调参与全球创新竞争与集聚国际人才相促进。

对外开放首先是人的开放,特别是人才开放问题。人才资本现在已经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中,知识和劳动者的素质在这当中占 70%,全球资本的存量,人力资本的存量占 64%。按照世界银行测算的数据,在自然、物质、人才资源等生产要素当中,人才资本比实物资本的重要性高出三倍,具体来说一名创新人才所能带动的经济增长是一名普通专业技术人员的 4 倍,创新型人才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 49%,中国去年整体人才贡献率在全国达到 33%,在北京、上海、深圳、苏州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 50%。

苏州的人才工作情况成效非常显著。2014 到 2015 年期间,江苏省人才发展研究院做了一个评估,江苏省省辖市的人才竞争力排名,整体的排名南京第一,苏州第二,相差不大。在以下方面苏州是占前列的:一是人才发展的平台竞争力,苏州在人才的经济平台、人才产业平台、人才财政金融平台、人才投资平台、企业的创新平台、创业平台这 6 个平台在全省都是第一,唯独低于南京的就是事业创新平台,主要是南京的高

校比较多,实验室比较多。所以在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来,苏州平台做的非常好。第二个,就是在创新人才的贡献竞争力排名当中,苏州也都是排在第一位,专利申请、专利授权、有效发明专利、重大科研成果和新技术新产品新发明,这些方面都排第一,总得分是 0.938,比南京 0.89 高不少,可以反映出来目前在全省的创新贡献度方面,苏州也是排在前列。

工业园区是苏州的品牌,工业园区很重要的经验就是:通过改革开放、中新的合作,转换了管理机制,尤其在干部培养方面,是改革开放中一个最大的受益者。同时,工业园区外国人才集聚程度比较高,在全国所有园区对外开放的集聚度当中,苏州工业园区是最高的,累计引进外国专家 1000 多名,5000 多名海外归国人才,创办了 500 多家企业。外国人才总量居全国开发区首位,被评为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在这方面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引进了一批世界的名校资源,成为全国唯一的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区,所以国际化程度比较高。

此外,吴教授指出了苏州在人才评估当中存在的四方面问题:

一是高端人才加速集聚,但与开放创新的发展仍不适应;二是人才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但人才发展的比较优势不明显;三是创业人才资源丰富,但科技创新人才仍存缺口;四是人才竞争力全省第一,但与国际接轨的人才体制机制体系尚未建立。

2016 年 5 月份,针对园区外籍人才发放的问卷结果表明,苏州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居留许可时间短,办理手续流程多,申请材料太复杂,办理周期过长,

需要找多部门办理等。外籍人才反映的问题是国际交流的平台太少,研发投入不足,成果转化难,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不接轨等。在对外资企业调查回收的 210 份问卷当中,反映最突出的问题是海外人才申请各级科技、人才项目难,缺乏薪酬、编制、岗位、用人的自主权,其他地区对海外人才的竞争压力比较大,引进海外研发团队的成员无法享受园区优惠政策等。这些问题在政策上有一些是苏州能解决的,有一些是需要和部委商量,是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制定的,所以在这一方面还是需要改革当中逐步推进。

吴江教授将苏州园区与美国的硅谷进行了比较,主要突出的问题是苏州园区的风险投资体系不够成熟、专利保护程度不够、中介服务资源不够丰富、科技后备人才不足。和新加坡的生物园区包括和北京的中关村比较,园区外籍高层次人才签证及居留办理程序不够简单、人才资源服务对外开放水平不够、国外高端智力要素开发不够。在国际化创新人才吸引集聚机制方面,园区与美国硅谷和新加坡相比,缺少专业化的猎头公司,新加坡也是有针对性的对高层次人才寻访机构和引进机制,中关村有建立完善的高端人才集聚机制和专业化的服务体系,这些方面苏州工业园区还有不少差距。对中关村来说,中关村的人才发展依托两个发展极,一个是中关村的科学城,一个是未来科学城。这两个战略高地实现了整合创新资源,吸附高端人才。在突出强调人才方面,中关村已经打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创新创业人才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领军企业、高等院校、原创技术多层

·专家视点·

次合作平台，天使投资和创业金融、社会与科技中介、创新文化 6 大要素相互关联、相互支撑，促进创新资源配置和开发利用，营造很好的人才生态，促进生态系统的跨境延伸。二是支持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协同创新平台，中关村支持高端人才组建 37 家新型社会组织，整合全市 110 多家社会组织的创新要素，为人才联合创新技术标准，协同攻关搭建了很好的平台。三是完善链条人才创业扶持机制，根据人才的不同特点，把人才的主体划分为在校大学生、初创企业人才、海归人才、雏鹰人才、高端领军人才等若干个层次，实施一系列重大的人才专项工程，与高校学生分层次的来对接政策和工程，构建了一个人才成长链条、人才政策扶持体系，相对来说苏州在培养高端、有潜力的创新人才还需要下工夫。最近下发的文件当中，总书记特别强调，引进外国人才时要关注年轻人，现在的创新活动、创新成果多在 25 到 35 岁之间，因此这一批人的引进和发现非常重要。所以，在人才集聚方面，既要注重量，更要注重质。从上海的新政可以看到，上海全球创新中心这个新政的重点是三个字，第一是“放”，就是更加开放，把它打造成一个枢纽地；第二是“活”，特别是在人才流动、人才自主权、评价自主权下放到企业里；第三是“优”，就是如何优化环境的问题，无论是中关村、上海、深圳的经验都可以供苏州借鉴。对此，吴江教授给出了以下七点具体的建议：

第一，致力于打造一个国家级的开放创新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在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当中，要进行差异化改革，

差异化改革就是融合到本地的创新当中去，通过政策创新、载体创新、方式创新来解决苏州存在的问题。在这方面试验区的先行先试要引领创新，在人事管理、投融资、税收、股权激励、成果转化这些方面都可以做一些创新实验，先行先试利用这种资源在全国率先实现海外人才的集聚持续优化、人才制度国际接轨、人才服务精准高效、人才环境开放包容，力争用十年时间建成体制机制和国际接轨、人才政策符合国际惯例的国际化创新人才集聚之都。

第二，围绕苏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需求，按需引才，突出高精尖导向，优化结构。目前苏州工业园区引进的人才存在结构问题，表明顶层设计还不够，还缺少一个引进海外人才的指导目录。引进优秀科学家，特别是青年人才，他们具有真正的创新活力，引进具有重大技术革新的科技领军人才，引进具有国际管理创新和跨文化经营管理能力的企业家，苏州过去不太注重高端服务业的领军人才，在服务业方面不管是知识产权的服务业还是人力资源的服务业，都和上海差距比较大，苏州缺乏一流的知识产权的专业化的服务队伍，专业化的水平还不高，因此高端的服务业可以从海外找这些领军人才。建立高层次人才，建立海外人才的数据库，通过大数据完全可以捕捉到苏州所需要的人才，进行精准化对接，特别促进人才和资本、项目的有效对接。

第三，搭建引才聚才国际合作平台，创新柔性引才育才模式。比如：打造国际化人才发展平台，融入世界级产业核心网络；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全球人才

招聘制度；支持国际组织、国际知名高校、科研机构、跨国公司来苏州开展科研合作，组建科研项目办公室，成立研发中心；放宽外国留学生在苏州工作限制，完善留学生实习居留、工作居留和创新创业奖励制度；鼓励外国人才参与苏州智库建设。

第四，建设海外聚才育才载体，打造“创新苏州”的世界品牌。政府重点选择发达国家的产业研发人才优势，以更加优惠政策，支持民营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个人在国外设立研发机构、科技企业孵化器、技术转移中心和产业化基地等，就地吸引使用外国人才。鼓励以投资、委托、合作等形式在国际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培养苏州所需专门人才。

第五，健全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利益回报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和产权激励制度。支持外国人才按照知识、技术、管理、技能等创新要素贡献参与分配。实行期权、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政策，允许外国人才通过技术股权收益、期权确定、资本市场变现等增加合法收入。完善知识产权收益分配制度，依法保护外国人才享有知识产权权益。

第六，提高海外人才服务保障水平，依法保障他们在苏工作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权益。依托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设立专门服务窗口，为海外人才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落实待遇等提供一站式高效便捷服务。培育信息化、产业化的国际人才服务市场体系，逐步放宽外商投资设立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的股比限制，提升人才服务国际化水平。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服务和语言学习机会，多形式多渠道帮助外国人才更好地融入苏州市民社会。同时，探索建立引进外国人才绩效评估和退出机制。

第七，探索发放海外华人姑苏卡，鼓励海外华人来苏投资创业。借鉴国际有益经验，申请国家公安部批准，在苏州发放海外华人姑苏卡，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出入境便利，居留期限不受限制。持卡人在苏州购房、医疗、社会保障、所得税、贷款额度、风险投资基金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享有国民待遇。

最后，吴教授总结，这个时代必须从全球人才角度考虑，从全球人才角度谋划，从全球的角度制定行动战略和制度，也必须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从全球的角度来组织创新行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央提出来的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创新梦。



• 专家视点 •

深圳经济转型：成功与前瞻



唐杰 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临时党委书记、经管学院教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富布赖特教授、副教授级客座研究员。历任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秘书长,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副秘书长、秘书长,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唐杰教授首先介绍了习总书记对新常态的概括,主要包括四部分:第一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第二从规模速度转向质量效益,第三结构调整,第四从依赖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他表示,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接着,唐杰教授汇报了深圳转型发展当中做的一些工作。深圳是一个无限传奇编织起来的年轻城市,现在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和创新发展代表。30 年前深圳起步的时候 GDP 是香港的千分之二,本世纪初深圳人均 GDP 是台湾的 1/3,2013 年已经超越台湾,深圳到目前为止应该是全球最重要的移动通讯装备生产和创新的城市。从目前来看,深圳正在成为中国重要的生物新能源与材料科学引领中心,在深圳之前,全球几乎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在 30 年时间里从农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连续转型。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现在深圳有近万种高新技术产品,半数以上是自主知识产权,深圳到目前为止也是中国大陆拥有 PCT 专利最多的城市,是最重要的科技成果和人才集聚地。

唐教授把深圳的转型发展概括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 年,当年的政府市委文件就是“三个为主”,大概持续了 10 年,即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是标准的 OEM 生产方式。第二阶段,1995 年深圳出现了一个转型,进行了较大的经济调整,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经济滑坡之后,深圳第一步转型是从 OEM 转成制造,就有了中国最著名的词汇就叫“山寨”,即 Made in SZ(戏称)。在这样一个模仿当中,是有重大意义的,深圳具有了大规模生产精品的能力,开始创造品牌,走向制造,现在来回顾这一段过程,在发展经济学里叫“模仿”,被认为是一个最



重要的方面,这是发展的必经阶段,关键问题是要能够迅速从“模仿”走向品牌化。第三阶段,深圳开始向制造转变,上个世纪末深圳开始转向制造,在这当中崛起了一批耳熟能详的企业,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讯,有的企业在整个中国创新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深圳的研祥,这是世界特种计算机排第二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深圳出现了一大批关键环节崛起的专业化创新的中小企业,深圳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第四阶段是从 10 年前开始的,深圳迅速从装配制造转向创造,在这样一个创造过程当中,深圳新一代无线通讯技术的专利占全球的 1/5,目前基因测序分析与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在全球都是在领先地位。

中国 A 股排名第一的是北京,第二是上海,第三是深圳,在全部上市公司当中,深圳排第一,深圳还有 120 家是在海外上市的,就是全球任何一个交易所只要有名的交易所都会有深圳的公司,大概深圳平均上市规模的总资产规模 120 亿,深圳可以排这样一个队伍,千亿级以上企业十几家,百亿级以上企业

一百多家,十亿以上企业一千多家,超过亿元企业那就有上万家,构成一个完整的企业群体的结构,这样一个结构当中,深圳的企业家精神最为突出。企业家有两个特征是必备的,一个就是非常有利的市场竞争环境,第二就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华为能够成为全球知名的企业,没有它在海外的 20 年的努力,就不会成为全球顶尖的企业。

目前为止,深圳已经成为全球信息技术产业创新的引领者。根据 2014 年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知识产权情况,美国企业有 6 家,分别为大家都熟悉的大名鼎鼎的企业高通、英特尔、微软、联合技术、谷歌、惠普,中国企业 4 家半,分别是华为、中兴、腾讯、华兴光电、华为终端,因为华为终端就是华为的,中国 4 家就是深圳 4 家。今年 5 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了 2015 年的数据,是关于国家的数据,美国是 58000 件,日本 44000 件,中国 29000 件,中国是美国的一半,排在第五的是韩国,假如深圳在这里排名就是第六了。

深圳已经成为了标志性的城市,在这个城市当中,深圳的国际专利占全国

·专家视点·



的比重持续 9 年占全国将近一半。苏州到目前为止人均专利拥有量在全国排第二，人均发明专利和深圳有差距，这个反映在科研领域上，有一些差别。实用新型在苏州更多，发明稍微差一点，这是苏州和深圳比较的差别，但是苏州按人均排名，在全国非常靠前。城市的商标也做了一个比较，在这个比较中，苏州大概排全国第 15，和深圳相比有差距，这个差距反映推出新产品的差距。深圳到目前为止已经构成了创造、创业、创新、创意与金融中心互动，按照李克强总理来讲是双创，深圳是四创。深圳有其他两个领域，在全国、全球领先的，一个领域是黄金珠宝制造，在这个领域，深圳到目前为止占全国销售量的 85%，深圳的黄金珠宝加工和德国意大利大致处在一个水平上，另一个即深圳是中国最大的女装基地，在全国名牌女

装销售当中，深圳稳定占 70%，深圳女装的生产量和销售量大概和韩国、日本东京地区处在一个水平。在这样一个水平上，深圳到目前为止已经没有服装厂，深圳的女装业都是设计业，是 T 台展示。中国无论办哪种名牌女装展，深圳的公司一定不会少。

此外，深圳正在成为科学发现和高等教育的重镇。深圳大亚湾中微子项目首席科学家王贻芳获得 2016 年度“基础物理学突破奖”，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该奖。从历史的长期过程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不断形成的，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结构调整也将持续进行。

此外，唐杰教授还指出深圳未来发展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

第一，创新动能的持续对新一代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替代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深圳的无人机当中工业无人机全国领先，现在深圳正在进入工业领域，但是这样一个过程还有很长的时间。

第二，深圳创新过程当中队伍越拉越长，传统落后产业的淘汰仍旧存在问题。

第三，深圳的生活成本快速上升、人

口高密度聚集，这对深圳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四，深圳在高速成长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问题。目前为止，对于深圳的创新过程，有理由猜测、怀疑或者担忧其被打断走向泡沫化，这是目前为止中国所有城市包括苏州在内也需要关注的。

最后，唐杰教授对深圳发展的经验还进行了以下总结：

第一，强化法治化的市场与有效市场的形成，只有法治化市场才是公平的，企业要创新，政府就要创造一个有效的市场。

第二，有为的政府要能够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这样的公共产品里包括大学，对大学的估计要适度，没有大学不可能有创新，只有大学也不可能创新。美国东部是大学云集的地方，如何把一个大学的成就变成一个商业模式，这是要探讨的。

第三，要打破垄断的科研体系，加大开放力度。

第四，鼓励创新竞争性产业政策，政府扶持企业理所应当，但是要防止支持变成垄断行为。

第五，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转型升级评价体系，能够估计到目前发展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发展前景。

唐教授还强调，如今最大的关键是要重视人的作用，过去重视的都是物品、投资，而今后最重要的是人才，深圳过去十年的转型实际也是人才的转型。

创新驱动中的科技金融



唐豪

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原副校长、科技金融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府参事，上海市第十、十一届人大代表，第十、十一、十二届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第十、十一届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原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

长期从事产业经济与工商管理学科的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对商务环境、产业园区、技术贸易、科技金融、互联网投融资等领域有较长时期的分析研究，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竞技体育产业研究》，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科技兴贸：关键技术与重点工程》，上海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研究课题《上海科技金融发展报告》《上海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2003 至 2012 上海民营经济发展报告》《上海民营企业创新转型提升之路》等应用性研究报告。

唐豪教授指出经济增长有四种推动在同一阶段并存，即要素推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一定阶段中必然以其中的一种或者两种为主。创新驱动非常困难，而投资驱动容易泛滥。

日本经济在 70 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财富驱动出现较为严重的经济泡沫，只因科技基础较好，泡沫断裂后经济悬至半空，损失 20 年。美国在过去的 15 年，在 2010 年之前，其实财富驱

动的动力较弱，因为金融衍生品，美国在 M3、M4 之后是非常厉害的，所以美国的 M2 是不大的，但是为什么也会有泡沫呢？2007、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于美国科技基础非常强劲，所以

•专家视点•

它受到了一些影响，几年以后就相对好起来了。中国目前总体上四种驱动同时并存。上海的投资总规模 7 年前同如今相比，没有增加，为 7000 亿左右。上海已经摆脱了投资驱动的阶段，但是真正要进入以创新驱动发展这个阶段困难还很多、任务还很艰巨。唐教授认为，苏州和上海在经济上、产业上关联度高，基本摆脱投资驱动，但是从数据来看，整个江苏省投资驱动较大，上海过去 7 年当中总投资只占 GDP25%，而江苏超过 50%。

唐豪教授指出经济产出尤其统计学意义上的经济产出是很有限的。有些科研成果无法推动经济增长，不驱动或者抵消驱动。上海一些百货商店最近都在关闭，电商 GDP 提高，传统商业落寞。所以上海跟苏州这样的城市，已经面临到其创新成果不能驱动本地的经济增长，所以创新驱动是非常困难的。

科技金融，狭义上指科技企业、研发企业在成长发展过程当中投融资的体制方式机制，广义上，包括研发产学研合作政府资助。科技金融是以科技企业的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为两个基本途径，应当在政府的引导支持下，动员社会各主体、各种社会资金，同时运用金融市场细分领域的技术方法来聚焦于科技型企业的创业成长和规模化技术再提升。科技金融的服务是全方位的、全过程的，在科技企业成长发展的不同阶段，资金的诉求不一样，就要求对科技金融这一非专业学术称呼的概念运用要全方位、综合性、跨区域、跨专业。

唐教授指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是传统融资两大基本途径。债股联动是

商业模式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的结果，债权和股权联动，双向联动是可以人为、事先的，是积极的因素。还有融资担保，目前有国有担保公司、民营担保公司、联保与企业互保、特效担保等。对科创企业可能更关注的是技术性融资促进和信用性融资促进，如果有健全的技术评价体系，存在一个可信的社会中介，凭借企业家及团队能力及在业界的信誉，相信民间资金是愿意投资的。对于科技银行，唐教授认为适当的放宽一点专利抵押，是非常鼓励和提倡的。

信用性融资促进，现在有很多创新性企业，背后就是依靠一个比较有信用的大公司，比如像阿里巴巴、腾讯和上海复星如果愿意出资，估计这样的创新性公司就会成长的更快。用社会条件、社会资源、政府帮助促进科创企业信用性团队能力的融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风险融资不太看数据，比较看中企业家跟创业者团队。

在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科技金融及相关领域政府到底可以做什么事情？唐豪教授认为创新要驱动很难，没有科技金融创新是无法驱动的，中国不缺技术数量，但中国缺两个



问题，一个是核心技术，一个是技术的高度。唐教授以上海大张江为例，指出政府在资金资助方面已开始拨款，包括有担保参与，有税收方面的。另外政府合同、政府采购也很重要，谈到科技创新，科技金融市场，一定不要忘记产权市场、技术市场、证券市场是有机的整体，所以科技金融一定要同这些联动，有很多风险投资为了最终上市愿意投，如果上市渠道有限他们也不愿意投，这是相互之间要匹配贯通平衡的。现在上海进入了一个城市更新阶段，就原来的厂房、原来的商务区通过大规模更新改造形成新的产能、新的技术，科技企业为代表的园区综合服务非常管用，尤其上海这样的城市，如何克服商务成本这么高的障碍，对科创中心也好，产业研发也好，尤其是人力资源成本跟物业成本。上海还有自贸区政策，一部分自贸区政策可以和张江高科跟科技园区逐渐打通，唐教授曾在上海张江的课题调研中提出“4+1”：风险投资、产业投资、贷款和担保，这四个词在大张江范围里面开始起到比较好的作用，政府可以研发资助也可以推动产业。另外，要尊重企业家功能，营造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唐教授认为，未来的科技金融一定要跟互联网金融、传统金融融合起来。未来应当关注金融科技的进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云计算是中心化的，区块链是去中心化，大数据正在不断发展，生物技术、遥感技术、信息终端技术的进步必将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科技的发展一定会有助于物联网金融的完善。P2P 客观上是需要的，互联网金融跟电子商务是一前一后的关系，也不要小看互联网金融，就是互联网金融的重要性要比整顿规范 P2P 重要，然后在互联网金融不断完善的情况下，科技金融也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



• 专家视点 •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产业创新升级



徐康宁 东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江苏省政府“333 人才工程”重点培养对象。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投资学会副会长、南京市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马鞍山市人民政府经济顾问、宿迁市人民政府经济顾问等。

长期从事国际贸易、产业分工及区域经济方面的研究，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一批省、市政府和大型企业委托的研究项目。先后出版《文明与繁荣》《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现代企业竞争战略》《产业聚集形成的源泉》等学术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动态》《中国工业经济》等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徐康宁教授从全球价值链重构讲到了创新升级的几个途径，提出了实施经济国际化升级版对产业创新升级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提出升级版的经济国际化就是既要加入高层次的全球价值链，又要加强全球价值链的自建，更重要的是徐康宁教授以此为基点，为苏州新的“凤凰涅槃”提出了九点很有价值的建议。

讲到当前世界经济，徐康宁教授用两个词概括：“暗淡”或者“景气不足”。2008 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到现在八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出现像样的复苏，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看不见的，哪怕上个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在 3-5 年之内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复苏，可是现在这场大危机八年过去了，始终没有像样的复苏，而且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比如全球化遭遇 20 多年的最大逆袭，不确定因素有增无减，“黑天鹅”事件接踵而来等。在今年秋季的 IMF 最新展望报告中，对于今明两年世界经济的展望是相对比较谨慎的，只有 3.1%和 3.4%。

各个国家的政府已经采用了很多的办法，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利率一降再降，一部分国家如日本、德国、瑞士已经出现了负利率，可是经济还是没有复苏。还有值得一提的是 50 年来国际贸易首次低于经济增长，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过去 50 年当中，国际贸易增长总是快于经济增长，可是现在却慢于经济增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料，全球贸易 2012 年以来一直到今年，连续 5 年低于经济增速。波罗的海(BDI)指数长期低迷，航运的繁荣跟景气程度也反映了国际贸易的状况，一跌再跌，在 2016 年 7 月份甚至比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还要低。金融危机之前达到一万点以上，2008 年 713 点，可是今年 7 月份跌到 656 点，虽然最近几个月有所回升，但

这个指数仍然是非常低的。

学国际经济的人总说不确定因素很多，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就如 2016 年出现那么多的“黑天鹅”事件。从深层次方面，徐康宁教授认为，这是整个世界经济结构性的矛盾。首先是经济发展的失衡，整个世界经济过去 20 年它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新兴经济体，表面看是好事，这个东方不亮西方亮，过去都是发达国家发展快，现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也快，可是过去 20 年新兴经济体之所以发展快，很大程度是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和技术，可是这些年由于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导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也跟着受累。甚至除了中国、印度等极少数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大部分新兴经济体辉煌不再。现在全球资产配置尤其是现金流严重的不平衡，是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非常典型的特征。现在发达国家都在提再工业化，就如特朗普能够上台，是因为他对美国人有许诺，说能让美国再度强大起来，让美国的制造业重新繁荣起来。那么怎样让美国制造业重新繁荣呢，特朗普说要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应该发展制造业。可是如大家所知发达

国家现在基础设施很差，美国很多基础设施不如中国。特朗普提出来要再度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可是发达国家想继续加大投资但苦于没钱，因为钱在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在中国现在又面临投资的机会逐渐减少，虽然有很多新的投资机会，比如上海专家提到上海建地铁的计划，再过若干年达到一千多公里。南京建地铁的速度也是非常快，已经营运 250 多公里，5 年之后达到 500 公里，差不多达到现在纽约的水平。如果和过去几年相比，整个中国现在投资的回报在下降，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投资的曲线斜率在下降，这是很矛盾的。发达国家现在没钱，特朗普提出来要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一万亿美元，大家觉得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可是中国今年 1 到 9 月份三个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就是一万亿，但是投资机会相对减少。

徐教授指出，国际分工越来越严密，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换来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全球价值链提升了生产率，但是全球价值链严密的分工一定程度上受困于目前的反全球化。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资本尽情享受于分工的高效率，而



·专家视点·

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技术进步的步伐。如苹果的手机当初的出现,让人感到眼前一亮,而如今再到 iPhone6、iPhone7,一次一次让人失望,这就是典型的案例。

现在的新经济很美好,可是并没有带来当初蒸汽机、交流电技术创新所创造的需求和就业那么大,分享经济大家感觉很时髦,看上去很迷人,但并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和相应的实体投资。拿 Airbnb 来说,出国人经常用 Airbnb,独角兽企业只要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就是独角兽,它的估值已经超过了 300 亿美元,超过全球第一大酒店集团希尔顿的市值,可是大家知道希尔顿在全球有几百家酒店,有几十万间房间,雇佣几十万人,可是 Airbnb 没有雇多少,因为他不需要,他没有自己的酒店,也不需要那么多服务员,他不能创造大的就业,也没有带来那么多连续性的实体性投资。

在这种状况下,全球价值链正在面临一个重构,世界经济长期低速增长已经是一个世界经济“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最早是华尔街提的,跟国内讲的“新常态”不完全一样,整个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是一个“新常态”,这种影响下全球价值链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国际生产的“分割化”和“外包”将面临新的调整,全球价值链中以后一定会出现研发生产一体化、市场就近化成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地域性生产价值链将有可能部分替代全球价值链,全球化不会消亡,也不会过时,但一定会面临重大的调整。

徐康宁教授在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尤其是当前世界经济的背景之下面临重构,对苏州如何响应省委主要领导提出来的创新方面的问题,以及实现产业创新突破谈几点看法。

就苏州而言,在全球化面临重构的背景之下,必须要走出自己的道路。最大的核心就是产业创新升级,并对产业创新升级概括了几种模式,从国内来讲,产业创新升级有这么几种模式,第一主要依靠院士的技术创新,解决产业关键性技术,以及带动一批新产业,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中关村模式,中关村里面涌现的那些企业基本上通过这种创新来带动。第二种杭州阿里巴巴的模式,并没有太多的院士的技术创新,更多是一种商业模式在产业内的创新,依靠互联网串起诸多的经济平台。第三种模式就是深圳,深圳是为了突出新产业和提升产业链层级的城市整体创新。第



四就是上海,是体现了结构优化的产业创新,尤其突出现代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苏州都不能全盘照搬,应该走出一条自己的产业创新升级道路。

徐康宁教授再次强调,苏州就应该靠实施经济国际化的升级版,推进全产业链创新升级,经济国际化水平高是苏州的一大优势,具有独特性,要不断加强、优化和提升。苏州的开放型经济现在面临新的问题,不能简单的重复走过去的老路,也不能把这个优势给丢掉,另起炉灶,否则将会带来巨大的伤害,应该启动实施经济国际化升级版,以此为抓手,通过升级经济国际化新内涵、新活动、新要素推进本地区全产业链创新升级。具体的来说,以往的经济国际化(开放型经济)是引入和利用国际生产要素,这种升级版的经济国际化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业的优质生产要素,为产业创新升级服务。以往的开放型经济或者说经济国际化只是简单的加入了全球价值链体系,而如今的升级版经济国际化应该是既要积极加入高层次的全球价值链,更要善于自建全球价值链。其中“自建”不一定完全是在本地,也可以是实现离岸的创新,而龙头在哪?哪就是连接这些要素的枢纽。徐教授认为,未来 10 到 20 年,充分发挥好自身的比较优势,苏州完全可以,在主动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当中,来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促进产业全面的创新升级。徐教授认为,最大的创新在于思维创新和制度创新。比如华为,它整合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值得借鉴和学习。全球著名的财经媒体《华尔街日报》每隔几天就有报道华为的新闻,华为和阿里巴巴是《华尔街日报》报道最多的两家中国企业。

在苏州如何实现新的“凤凰涅槃”的

问题上,徐康宁教授强调,第一个要进一步拓宽视野聚焦全球,为产业升级配置优质资源。苏州有吸引人才和技术的资金。苏州应该举全市之力,打造若干家具备全球配置优秀资源能力的龙头企业,发挥示范效应,带动一大批产业创新升级。深圳的华为和腾讯,带动更多的企业去创新,就让整个深圳的创新氛围无比浓郁。苏州现在也需要一个龙头企业。在全球配置优质产业资源不一定要配置到苏州来,而是通过苏州的产业创新,通过苏州的创新型龙头企业在全球配置,苏州要想实现“凤凰涅槃”、实现产业的创新升级,这块土地上一定要涌现出自己的“华为”、“格力”、“鸿海”,不一定比规模,而在于整合全球要素能力。从向资本引入倾斜转向向技术引入倾斜,优化土地、科技、税收等政策,促进国际产业链提升层级。苏州需要大力引入国际先进服务业,适当的“软化”苏州的产业结构。

最后,徐康宁教授强调,苏州的产业创新升级要着眼于全球,苏州应该定位于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长三角国际都市群的增长极、国际化先进产业基地建设,大力丰富城市元素。要大力引进国际优秀产业人才,尤其是把握产业发展方向、掌握产业关键技术的领军人物,包括非华裔外国专才。苏州的国际元素佳,不能仅仅停留在表象上,更多要加强内涵建设,甚至包括成立专门的机构,引入外部力量加强对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国际产业发展的动向深入研究,提升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研究的水平等。苏州要进一步思想解放转变观念,为实施经济国际化升级版和促进产业升级营造更好的环境。

·专家视点·

新常态新理念新变革——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

**史健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兼任上海教育管理学学会副会长、上海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研究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战略管理及公共政策研究，先后主持和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国家发改委重大项目、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 20 余项，委办级、企业集团委托重大课题几十项。在《湖南社会科学》《上海经济研究》《情报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

曾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二、三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一、二、三等奖、上海市决策咨询一、二、三等奖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

史健勇教授聚焦苏州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分析了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现有的基础条件和面临的一些挑战，提出了苏州制造业向四化发展的新方向，并且指出要聚焦四大重大领域，落实四类关键举措，打造四大平台。

在讲新常态时，史健勇教授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传统经济发展动能规律性减弱趋势明显，发达经济体需求不足，增长率低位徘徊；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变化，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局面持续。我国步入新常态，按照总理说的“要让新的动能逐步挑起大梁”，也就是高新技术的产业要有发展，旧的动能也就是传统工业要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因此，新常态给中国、给苏州带来了新的创新发展的机遇。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相继出台了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等战略与指导意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理念是方向，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

史健勇教授的课题组针对当前国内外形势变化，特别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以及长三角经济带等重大战略举措的提出，以及双创行动纲领的推出，基于苏州的城市定位，制造业基础及优势，探索提出了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变革方向。苏州已经发布《中国制造 2025 苏州实施纲要》，应该说这是紧跟国家的战略步伐，为进一步激活市场，转变体制机制带来了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

史教授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正面临重大挑战。从国际来看，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发达国家启动“再工业化”战略，寻求制造业回归，制造业生产模式和形态发生变化，智能制造成为趋势，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改变，国际产业转移出现新变化，全球制造业价值链面临调整。同时，传统的竞争力要素，如劳动人口、劳动力成本等也在发生变化，新能源、新材料、创新政策等要素成为新的驱动因素。再看美国、德国、英国等制造强国，制造业正在回归，马来西亚、印度、越南等国家也作为低成本制造基地正在悄然崛起，应该说这是对我国的一大挑战。

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制造业亟待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消费结构升级换代，倒逼中国制造提升竞争力。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制造业成本优势、人口红利逐步丧失。安徽省、江苏省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社会的公共福利也带来了比较沉重的负担。虽然面临压力，但也注意到，巨大的内需市场是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我国具备强大的制造业产业基础、拥有完整的制造体系，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方面，也已具有强大的技术基础。

从苏州来看，苏州制造业有转型的基础，同时也面临挑战。转型基础方面，制造业的产业基础比较雄厚，产业规模在全国处于领先，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基础的产业链基本完备，苏州提出纳米技术和生物医药等两个创新的特色产业，也已经逐步形成，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加大，城市创新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外资辐射与溢出效应正在逐步扩大，这是创新转型升级发展的一个优势。但是苏州制造业在创新转型的过程当中也面临挑战，低端制造业虽

然正在逐步淘汰，但是传统的优势产业有待进一步升级，外资品牌入驻率相对较高，但自有品牌知名度有待提升，创新投入有待进一步加强，高端人才的创新实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智能制造的工业基础相对扎实，但是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依然很高。

对苏州而言，经济新常态对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新要求，供给侧改革为苏州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动力，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也为苏州制造业的协同创新提供了新的平台，上海科创中心和自贸区建设为苏州制造业的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新常态下，按照新理念、新要求，苏州的制造业转型必将带来新的变化。

第二，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思考。依据苏州市委市政府“落实中国制造 2025 苏州实施纲要，推动制造业向高新化、品牌化、服务化、智能化发展”的要求，史健勇教授提出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思路：以制造业创意产业为突破口，构建以高新技术为基石，以特色品牌为抓手，以生产服务化、制造智能化为主线的新型制造业创新生态体系，推动苏州制造业向“高新化、品牌化、服务化、智能化”发展新变革。

首先，高新技术产业上，将苏州打造成为国际领先的有一定知名度的制造业创新高地，技术创新是制造业发展的基础，高新化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石。苏州制造业的高新化以建设“国际领先的制造业创新高地”为目标，通过科技创新夯实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础。第二，品牌化。品牌化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抓手，打造享誉全球的“苏州制造”品牌，要利用苏州特色品牌、特色文化来讲苏州的故事，通过产品打造提升企业品牌，进而提升整个城市的品牌。第三，服务化。形成特色鲜明的高端制造业服务中心，服务化是苏州制造业

•专家视点•

转型升级的主线之一。苏州制造业服务化以打造“高端制造服务中心”为目标，围绕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创新制造业服务新业态。第四，智能化。智能化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另一条主线，以“创意协同的全产业链智能化”为目标，推进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推进创意要素与制造业的融合，重构制造业创新价值网络。

第三，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几点创新突破。基于制造业发展趋势以及苏州的基本产业基础和优势，史健勇教授认为制造业创意产业可以作为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制造业的创意产业是指将创意的意识、理念渗透融入制造业产业各个环节当中，使制造业与创意产业成为企业核心的增长要素，为制造企业的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提供服务。苏州在打造制造业创意产业的过程当中，有它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制造业的创意产业是创新要素在制造业的一种集聚，将创意与创新的要素融入产品制造，已经成为制造业发展的一种内在的需求，将创意与创新的要素融入制造业，是应对全球价值链竞争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现在各个地方都非常注重制造业的创意设计、生产、营销这方面的工作突破。从苏州来看，制造业有很强的发展基础，同时，苏州生产性服务业也有良好的发展态势，能够为制造业创意产业提供产业支撑，同时，苏州也是具有创新活力和要素集聚的城市，因此，苏州要进行制造业创意产业的突破。可以扶植一批制造业的创意产业，培育建设一支制造业创意队伍，形成一批创意、创新集群，从一般性生产性服务当中提升出来，到 2020 年把苏州建成我国制造业研发设计中心、创新人才高地、自主品牌的重镇，到 2025 年把苏州建成亚太制造业创新创意产业高地和品牌名城，这可以作为一大愿景。

史健勇教授强调，在这个过程中，一

要强化融合发展，也就是说在产业链上促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推动创意产业从广度和深度入手，创意渗透在研发、设计、制造、营销、服务等各个环节。二要加强自主创新。要把过去从主要依靠国外企业、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改变现有的技术引进模式，加强引进吸收消化和再创新，特别是在技术引进的模式上，可以采用“硬件 + 软件”将人才团队捆绑式的模式。三要聚焦重点领域，苏州一些重点的产业在这方面都可以是创意制造业产业发展的抓手（比如软件、集成电路、大数据、纳米技术、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包括交通运输等），在重点行业领域尽快形成研发、设计、品牌策划、营销等产业形态，形成上下游配套、功能丰富的产业链。以产品设计创新和品牌提升为重点，不断壮大制造业创意产业的两端，助推产业快速发展。四要注重结构的优化，利用外资企业的外溢效应，激励大型国有企业的创意动力，扶持小型民营创意企业，鼓励加大创意投入、挖掘各类企业的创意潜力，提升制造业创意产业的整体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五要提升品牌，从产品竞争向品牌竞争转变，改变现有的依靠价格优势抢占国际市场的格局，通过创新、创意实现制造业、服务业、苏州特色文化产业的融合，打造和提升苏州民族品牌。

第四，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路径，主要有四大举措，打造四大平台。

首先要加快科技创新，推动制造业高新化发展。对传统制造业的瓶颈技术进行突破，要注重对绿色环境的维护，加大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发展力度，同时要积极发挥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其次，打造重点工程，实现制造业品牌化。实现苏州制造，提升苏州的品质，完善服务网络、吸引高端资源、提升内涵建设，打造享誉全球的“苏州制造”品牌。第三要优化苏

州的供应链，提升制造业的服务化功能。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在服务方面应该提倡政府的引导功能和协调功能，从企业家角度来说，应该是在市场找到答案，政府应该在人才、资金、税收等各方面实行人性化、个性化、有特色的生态服务环境。最后，加快两化融合，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建设制造标准体系，推进智能制造工程建设；构建信息平台，推进制造业集约提效发展；建设高能级的科技基础设施，打造科技服务统一平台等举措。

关于四大平台，第一要打造产业载体平台，形成企业孵化、加速器全链条的产业平台。构建产业基地、产业城区、产业社区和零星工业用地融合发展的产业园区空间新体系；依托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大学校区、文创基地、科技孵化器、商圈楼宇、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众创空间”。第二，打造技术创新的平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共同打造创意中心、高校的重点实验室以及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形成技术平台。第三，打造产业创新转型发展金融平台。不仅要注重战略的经济扶持，还有科技性战略扶持，金融工具要为产业服务，特别要强调知识产权的资本化，强调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扶持作用，资金要做加法，税收要做减法。第四，打造产业人才发展的服务平台，不仅要引进高端的人才，同时也要培育现代服务业的创新人才，以及高素质的管理人才，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在这过程中要注意的是引人、用人、留人和激励人的机制。

苏州是一座有着天堂美誉的历史古城，也是拥有开放包容的现代新城，苏州制造必将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跨越，必将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专家视点·

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企业创新



蒋伏心 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原院长、创新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江苏省教育系列、社科系列、党校系列职称高评委委员。曾任英国 GLASGOW 大学客座研究员、德国 KONSTANZ 大学客座研究员、美国 Kennesaw 大学客座教授。1990 年获江苏省“十大杰出青年”提名,获“江苏省新长征突击手”、“江苏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荣誉称号,入选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1998 年成为江苏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获“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称号。

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学说史、比较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企业理论。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欧盟合作课题和省部级课题。先后出版学术著作 8 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蒋伏心教授将产学研深度融合与企业创新结合起来,以企业创新为落脚点,阐述了自己的几点思考,并指出了产学研合作中存在问题的原因,以及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路径与方式。

首先,关于当前企业创新中存在的问题。蒋教授认为第一个原因是创新内生力不强,企业应该是创新内生力很强的部门,但是实际上在我国不是这样的,尤其是国有企业创业的内生力不强,我国的国企有大量的闲置资金,但因为创新有风险,所以害怕尝试。那么民营企业呢?在这十年当中曾经有一段时期民营企业创新的内生力是很强的,也出现了很多非常好的民营企业,但是这一阶段时间较短,原因之一就在于民营企业找不到正确的投资方向。内生力不足是阻碍进一步创新的最大障碍。原因二企业普遍存在研发“搭便车”的现象,不愿投入,只要产出,至于“搭便车”的现象为什么存在,则与创新环境有关。原因三目前产学研结合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要进行产学研的深度融合。虽然一方面政府是在推,高校也在跟,但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还有就是体制上的障碍。原因四自主创新的人才匮乏。蒋教授提出自主创新人才不仅仅指技术人才,实际上一定是复合型人才,或者是一个非常强的复合型创新团队。原因五创新和商业模式结合不佳。蒋教授认为现在很多非常好的技术,却找不到好的商业模式,他强调马云是一个特例。有很多非常好的技术,但找不到非常好的商业模式,这是一个大问题。

其次,对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度解剖。

第一,两张皮的问题仍未解决。蒋教授指出,最近中央国务院也在发文件,希望解决两张皮的问题,也鼓励高校的

老师参与企业合作,可以得到报酬,但是这个问题他认为短期内很难解决,除非高校评估、学科排名这样的问题得以解决,否则学校不可能愿意让老师到企业中去。第二,产学研的合作基础不稳固。不稳固的原因主要在于能力缺陷、利益冲突与文化冲突。蒋教授特别提到,江苏有那么多的高校、院士和教授,有那么多好的学科,但不一定就会有好的创新项目,有好的成果。事实上,很多学校的专业、教授虽然学术科研成就很高,但是缺乏和企业沟通、融合的能力,双方难以沟通。除此之外,高校和企业之间还有利益冲突,企业担心教授这个项目不是最好的,教授则担心得不到收益,没有利益保护机制让产学研形成健康的利益关系。再者,文化冲突,从价值观到行为习惯到语言等也会对产学研合作产生影响。第三,产学研的合作缺乏市场作用的合作方式。这种合作到底是一种行政行为还是市场行为,还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没有准确的定位,如果没有定位,就是一种市场行为,那么产学研合作就不可能走远,这个问题也值得探索。第四,信息不对称下的信任缺失,这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这个缺失的根源不在于产学研本身,而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时间比较短,整个社会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信任体系没有真正的形成和巩固。

最后,对于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路径与方式提出了四点思考和建议。

第一,产学研要有正确的定位,产学研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蒋教授把它定位为制造业的服务外化,也就是高校自身是一个提供服务的企业,然而这样有一个问题,高校不是企业,高校不仅有社会服务职能,还有其他职能。但是如果这样定位的话,就没有办法充

分利用市场来建立关系。产业技术创新为目标的产学研合作必须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而市场有自身的分工问题,高校要找到分工当中的位置,并且国家要允许高校以这种身份参与其中。

第二,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既是目标也是过程,蒋教授认为这个过程在今天是不可一蹴而就的,必须要建立一个深厚的基础。不能用政治上的动员方式,也不能用行政的号召方式,而是要用一种市场的方式,如果高校老师不迈出这第一步,今后的产学研合作质量也不会有多高。

第三,技术交易市场的科学建立和有效运行是建立健康、可持续产学研关系的保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非常重要,但也非常困难,到目前为止,中国真正能够办成产权交易市场并且一直持续下去健康发展的先例并不多。所以他建议就苏州而言,应该要把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变成开放市场,作为引领产学研合作和推动苏州创新的一个抓手。如果苏州这个市场变成一个区域市场,甚至是一个国际市场,那么就会有大量的技术向苏州来,技术来了以后就会有资本,所以他认为这个市场建设非常重要。

第四,政府对产学研融合的推动方式必须改革。从创新生态来讲,政府要用好手上的行政资源,政府的资金要杠杆投入,一定要用到最关键的地方,精准投入。政府一定要设计好自身在创新体系当中的作用,每一分钱都要有人负责任,这样才能把所有力量向创新的方向上逼。他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今后 3.0 版本的创新苏州肯定会更加精彩。